

今天 2012年秋季号 总 98 期

目 录

霍布斯鲍姆纪念小辑

纪念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17~2012)

Donald Sasson

面对失败

Perry Anderson

小说

秃头青春
万夏

七十年代

重影
汪晖

红花寺的日子
王慧侠

马雁纪念小辑

马雁小说选

一泼鲜血的旗帜
韦源

滚烫的心落下来，总得有人接得住
廖慧

印象里的马雁
周瓚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
姜涛

缓慢的樱桃
秦晓宇

今天读旧信，想起一位早逝的女孩
翟永明

纪念诗
廖伟棠

悼马雁
席亚兵

诗歌

小引诗九首
陈均诗十首
苏瓷瓷诗十首
黎衡诗八首

青年论坛

消费文化时代的四大古典名著
李云雷等

今天画页

创造性的继承：一位当代艺术家的中国实验
——李陀对话杨宏伟

面对失败¹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²

翻译：胡新余

在《极端的年代》开篇处，霍布斯鲍姆宣称，曾主宰了短暂 20 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其实只是一种任意的、人为的建构，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有很有限的历史相关性——长远来说，这种对立可以和宗教战争或十字军东征相比。在该书的结论部分，霍氏重返这一主题并写道：“那种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呈现为互斥、对立的两极的论点”很可能“在新的千年中变得毫无价值，这就和 16、17 世纪天主教徒与各种宗教改革者之间关于何谓本真基督教的争论在 18、19 世纪变得毫无价值一样。”

这种类比不仅作为辞格起作用。在《极端的年代》稍显特别的一章“对抗共同的敌人”中，它成为整个叙事的结构特征。这一章专门处理 1935~1945 年间的反法西斯联盟问题，其可观的长度超过了该书对法西斯主义本身的描述：战前的人民阵线 (the Popular Fronts)，1941 年之后各国的抵抗运动 (the Resistances)，尤其是最终击败了德国军队的苏、英、美之间的军事同盟等都得到了讨论。霍布斯鲍姆指出：在这里，界线不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而在启蒙运动的后继者和反对者之间。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体动用了极为庞大的军事力量，这个统一体“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持久的”：就意识形态来说，它建立在对进步、科学和教育的共同信仰上，在实践中，它以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为基础。在很多方面，这一共同阵线的胜利成为“20 世纪的转折点”。

在霍布斯鲍姆的理想化图景中，苏联和美国成为同伴，它们最好的品质彼此相通，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图景中愿望投射的部分。历史上，资本主义体制和共产主义体制在其必要的联盟中始终在一种冰冷的、以对方为工具的距离中互相打量。对斯大林来说，苏联和美国的联盟与此前苏联和德国的结盟没有什么区别（他对两个国家都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同样，杜鲁门曾欣然接受纳粹对苏联的进攻，将其视为对两方力量的削弱，而作为应急计划的对苏联的核闪电战在战争结束前几周内就已经开始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持久的统一体”并不比法西斯主义本身来得更长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殊死对立的体系，而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冷战是最自然不过的结果。在霍布斯鲍姆的构想中，各种类比混合在一起，这些类比将 18 世纪和 17 世纪颠倒过来：启蒙运动只持续了 5 年（二战中的结盟），之后则是长达 45 年的宗教战争（冷战），——这本身就已能说明问题。

¹ 原文最初发表在《伦敦书评》(<http://www.lrb.co.uk/v24/n20/perry-anderson/confronting-defeat>)，本文为节译。

²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1938-)，1938 年生于伦敦，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他主持《新左派评论》达 20 年之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评价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理论遗产作出了多方贡献。安德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他反对线性进化历史观和单一模式。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从他已发表的两部历史研究著作的标题看，“过渡”(passages) 和“系谱”(lineages) 都是复数。这是明确地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过渡》不仅对欧洲封建社会的起源和性质提出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于西欧和东欧的不同发展道路作了比较。《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更是致力于通过西欧和东欧的比较，建立绝对主义君主国的地区类型 (regional typology)，揭示其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不同角色。

冷战中彼此对立的观念涉及领土，而不是神学：它们关涉在这个世界中互相竞争的社会组织框架，而不是世界之外某种超自然神灵的教义细节。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这些观念，因为即使冷战已经结束，它们仍与我们密切相关。

《极端的年代》本身就对这一点做出了清楚的说明。依据霍布斯鲍姆的叙述，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个摆脱了各种过时的教派激情的和平世界，人们以为这些激情通过当代的“乌特勒支条约”³已经冷却下来，但事实远非如此：冷战终结将我们推向不可预见的暴力与社会绝望的洪流之中。事实上，这正是《极端的年代》核心部分所传递出的引人争议的信息。据霍布斯鲍姆所言，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对苏联的胜利既不是中性的，也没有带来什么有益的后果，它既不是对差异的错误标识的简单移除，也没有为冰冷的专制之地带来自由与繁荣的希望。相反，苏联的解体是“一种不曾被遏止的灾难”，它将苏联推向堪比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衰退之中，并在欧亚大陆上制造了一大片遍布混乱、冲突和生死危机的区域。同样，从世界层面上来看，十月革命曾两次挽救了资本主义。通过在战场上击败纳粹以及战后迫使西方社会进行预防性改革，资本主义避免陷入自己创造的深渊。现在，那种对资本主义野兽本性的遏止已经消失了，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损失。

《极端的年代》出版五年后，在题为《新世纪》的一次与安东尼奥·波利特（Antonio Polito）的访谈中，霍布斯鲍姆说他低估了苏联解体这一灾难的严重性：“简单地说，俄罗斯所遭遇的人道灾难的程度是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不能理解的。我也不相信20世纪还有什么灾难能与之相比。”这篇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访谈可以视为《极端的年代》的尾声。在访谈中霍布斯鲍姆提出，1991年的历史断裂比1918年或1945年的两次具有更长远的影响。简言之，霍氏对苏联社会主义瓦解所代表的历史倒退的严肃性抱有信念，而我们则很难不夸大这一点。

不过，也正是这一点揭示了《极端的年代》核心处存在的张力。在这本书中，两种关于短暂的20世纪不可协调的构想彼此冲突着。一方面，霍氏认为从1917年开始直到1991结束的两种社会体系的对立只是一种假象：在敌对之下永远存在着无害的相似之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同样时代错乱的教条体系的臆造。另一方面，革命性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以灾难收场，一种体系被另一种体系终结，但这种结局却只标记了两者差异被抹除后、所有那些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就能确定哪种构想更为可信，或在该书的结构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灾难，而不是和解，才是《极端的年代》的基调。正是20世纪以灾难收场的视角决定了这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因为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大滑坡”全面对立“黄金时代”，即使如此多因素都有资格成为或翻转了两个时代的特征，那么答案是很明确的：是苏维埃实验起初缓慢终尔急剧的衰落决定了20世纪的时间轨迹。⁴

³ Treaties of Utrecht, 1713年4月至1714年9月法国、西班牙同反法同盟国家为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分别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因首批条约在荷兰的乌得勒支签订，故名。这些条约使英国在殖民地的势力大为增强，法国称霸欧洲的局面告终。此处为喻义。

⁴ 依据安德森在前文的介绍，《极端的年代》将1914-1991年间“短暂的20世纪”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大灾难年代’（The Age of Catastrophe），从一战的大屠杀、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直到二战的大动乱及其直接后果，包括欧洲旧帝国的瓦解。其次是‘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大致从1950年延伸到1973年，包括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以及混合经济形式和社会保证体系的扩散，同时伴随着苏维埃联合体内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因为后殖民国家的农民抛弃土地涌入现代城市而导致的第三世界‘中世纪的终结’。最后是‘大滑坡’（Landslide），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经济衰退开始一直延伸到当下，这一时段见证了西方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困顿，东方苏联的解体，北方国家普遍的社会-文化上的失范，南方国家种族冲突的蔓延。”但如下文所示，霍布斯鲍姆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调整了结构，

以其特有的直率，霍布斯鲍姆曾揭示了《极端的年代》一书的结构如何随着他的写作而改变。在该书出版一年前的一次讲座中，他曾解释说这本书起初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灾难时代，这个时代从一战的爆发开始，到二战及其余波结束；其次，从1940年代晚期到该书写作时止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时代：在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的大跃进”中是资本主义的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崛起，在这个时代，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俄国人民生活条件比此前任何一代人都好。不过，如霍氏在讲座中所说，世界格局的两种变化让他修改了自己的视角：首先是1990年代初期苏维埃共和国的崩溃，其次是与之同时发生的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困难。当然，我们很清楚哪种变化更具决定性。如霍氏自己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衰落”至少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日本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1991~1992年间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这种衰落最新的表征而已——事实上，“衰落”就在霍氏原构想采用的以50年为限的孔德拉季夫周期中。⁵是苏联的垮台改变了一切。

苏联解体所具有的决定性在该书最后呈现的结构中得到了证明。事实上，只有从原初四部分结构出发，“对抗共同的敌人”一章的位置和前提才具有意义。也只有从这种视角出发，人民阵线的胜利才会成为“20世纪的转折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历史只有在经历了库尔斯克和巴斯托涅的磨难后，才会从前所未有的集体灾难走向同样前所未有的普遍进步。一旦转换为三部分结构，这一章就会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出来。在《极端的年代》其他地方，清晰可见的主题压缩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结构变化，我们才会在“黄金时代”部分看到，关于战后世界社会和文化革命的连篇叙述根本没有局限在三部分结构所限定的1950~1973年间，而是一直延续到四部分结构的末尾——甚至，对社会革命的叙述明确地延伸到2000年，这完全超出了该书本应有的界限。在这里，三部分结构建立其上的各时段形式上的对立明显只是后来的叠加，隐藏其下的，则是霍布斯鲍姆一直强调的主题的延续。

如果说在《极端的年代》最后版本中，两种关于世界的不同构想共存而不是一种完全取代另一种，这是因为两者对应于作者同时具有的两种政治激情。霍氏本人曾对这两种激情做出描述。首先，是对人民阵线的怀念，在这种怀念中，人们曾相信狮子和绵羊能够和平相处。其次，是对十月革命的忠诚，对这种忠诚而言，是十月革命之剑划分了世界。不过，两种激情构造《极端的年代》的方式却有共通之处。在其讲座中，霍布斯鲍姆曾对听众说：“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或许是我绝大部分清醒的时光，都奉献给一种被明确否定的希望，一种确定无疑失败了的事业，这就是由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不过，也许没有什么比失败更能磨砺一位历史学家的思维。”

为了支持这种观点，霍氏从另一位曾经历了失败的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 (Reinhard Koselleck) 那里引用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如我们所知，科泽勒克曾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将领冯·保卢斯 (Von Paulus) 部下的老兵：

“胜利一方的历史学家可以毫不费力地在长期的‘之前-此后’的目的论中解读短期的成功。失败一方的历史学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首要体验是所有那些被期望、被计划的事情都落空了。比起前者，他们更有必要去解释为什么事情如此发生……从近处看，历史也许是被胜利者创造的。但从长远看，我们总是从失败一方的历史学家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三阶段只是最后成书时的样貌。——译注，下同。

⁵ 孔德拉季夫周期 (Kondratiev)，指持续约50年的一系列经济收缩和扩张的循环或波动周期，1920年代由经济学家尼古拉·孔德拉季夫提出。

当然，霍布斯鲍姆指出，失败本身不一定就能带来洞见。不过，从修昔底德开始，失败就一直是产生洞见的重要激励元素。霍氏有资格将《极端的年代》置于由修昔底德开始的谱系中，该书无疑是当代对此最令人钦佩的证明。不过，即使科泽勒克的论证非常有力，他的观点却是片面的。在强调失败者的认知优势时，他忽略了与那些优势相伴而生的诱惑。首先，就是失败一方的历史学家对安慰的寻求。正是在这里，《极端的年代》关于“短暂的 20 世纪”的两种构想交织在一起，因为两者未透露出的信息都是翻转失败。回溯性的人民阵线之梦在于证明没有一方战胜了另一方，因为现实中我们在同一条战线上。同样，对“大滑坡”的论证意在说明根本没有胜利而言，因为现实中另一方也失败了。安慰的两种方式不同，一种是欣悦的，一种是威胁性的。两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代言人：波利安娜，卡桑德拉。⁶不过，如果“没有输家”和“另一方也失败了”两者的效果在心理学上非常接近，作为历史论证，它们却截然不同。前者没有任何支撑，相反，后者决定了《极端的年代》一书的结构和方向。无论我们对“大滑坡”时代的过度延长能提出什么批评，至少，它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长期的经济衰退以及独联体国家深重的社会危机中找到论证。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和后-共产主义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马耳他和巴黎建立的国际秩序霸权有所削弱或不稳定。我们看到，这一秩序霸权之外的尝试充其量只是暗夜中飘忽不定的磷火。否认这一点就是政治上的自我欺骗。霍布斯鲍姆对作为时代主导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不断的贬低正是这种自我欺骗征兆式的后果。《极端的年代》论证道，既然没有一个政府曾长期实践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任何一种纯粹教条都会成为短命的幻想。确实，“新自由胜利主义并没有逃过 1990 年代早期世界经济的退步”。四年后，霍氏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后再次宣称“新自由主义之死”。现在，我们看到《有趣的时代》（*Interesting Times*）传递的仍是同样的消息，尽管作者的语调已有所缓和。我们被告知，近期投机泡沫的破裂“也许”宣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消亡，这一次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悔恨之情：“人们早就开始宣布全球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我自己就不止一次这么做。”

这种明显无法严肃对待敌人的立场与之前我们提到的霍氏在智识上贬低敌人的一般做法是一致的。霍布斯鲍姆和斯图亚特·霍尔是 1980 年代《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的两位主要评论人，不过在两者之间却永远存在着差异。两位评论人都致力于对传统的左派提出批评，不过对霍尔来说，“复兴之路”上我们必须承认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后者为英国人民建立了一种新的共识，而霍尔本人就曾对之予以密切关注：他指出，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种霸权，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替代者。与霍尔不同，霍布斯鲍姆则将重点放在反撒切尔主义阵营的分裂上，并对撒切尔夫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一笔带过：他坚持说，撒切尔夫人在选举上总是相对较弱的。霍布斯鲍姆指出，重获权力的方式在于重新赢回那些被 1979 年的“不满之冬”大罢工（Winter of Discontent）和旧工党疏离了的中产阶级，而夺回权力的关键则是务实：正式或非正式的“自由党-工党协议”（Lib-Lab Pact）。⁷

⁶ Pollyanna，波利安娜，是极度乐观、盲目乐观的代表人物。Pollyanna 起源于美国作家埃莉诺·霍奇曼·波特（Eleanor Hodgman Porter）1913 年创作的系列儿童小说《波利安娜》，1960 年这部小说被迪斯尼公司改编为电影。Cassandra，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凶事预言家，不为人所信的预言家。

⁷ “不满之冬”指 1978 年-1979 年冬天英国工会因不满工党政府通过限制工资增长的方式遏制通货膨胀而组织的大范围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赢得了 1979 年的大选。

后来的局势发展对两人的观点都做出了裁定。布莱尔赢回了中产阶级，并且凭借未曾言明的自由党-工党协议获得权力；不过，他却根本没有对撒切尔主义做出回击，相反，他将其采纳为自己重获权力的意识形态条件。由此，霍布斯鲍姆曾倡导的忽视观念的务实路线仅仅制造了他本人所憎恶的变种。《极端的年代》进一步延伸了对经济理论的不屑，宣称将凯恩斯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区分开的只是一场“不可协调的意识形态之战”，每种意识形态都以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先验观念为基础，其立场“几乎不可论证”——如果霍布斯鲍姆仍在国王学院任教的话，他自己就会对如此看待经济学学科表示不满。

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力量的低估——我们只要想想哈耶克作品所涉及的范围及其一致性——同样迎合了一种更为我们熟悉的政治渴望：在糟糕的时代里寻找好消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鼎盛时代所设立的系统也许会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压力下最终崩溃，尽管如果这一点属实，将会使任何一种孔德拉季夫周期失效——开始于1973年的经济收缩现在已经进入其第三个十年，超过了它本来的25年界限。不过，如果缺少一种能够从哲学、技术到政治层面全面阐释当前局势的、新自由主义之外的理论框架，霍布斯鲍姆对之抱以希望的那些革新将很难成为现实。《有趣的时代》不得不以斯蒂格利茨⁸和阿马蒂亚·森⁹为救命稻草，这就好像诺贝尔奖成为知识希望的象征。

《极端的年代》对国际关系体制的处理方式也并无不同。如果说新自由主义仍是时代的支配性意识形态，那么在一种崭新意义上，时代的霸权力量是美国。随着苏联的解体，可以任意支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的美国成为历史上首个享有全球主导权的国家。当霍布斯鲍姆完成其“年代四部曲”时，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地位已经很明显了，但“四部曲”却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在这个主题上，《极端的年代》所说的只是“在1914年使用该词的意义，美国是唯一一个可以被认作超级力量的国家。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却并不明确”。该书结尾部分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主宰者的体系，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缺乏控制。为了面对“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力量”的现实，《有趣的时代》已调整了视角，不过该书仍然令人不可置信地坚持“美利坚帝国不知道拿自己的力量怎么办”。这种美国意志的不可理解性的观念其实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暗示，在国际秩序中没有真正的导向。

日常经验所提供的证明则恰好与此相反。所有霸权都有局限，没有一种政策曾真正达成其目标。不过，当代的显著特征并不是世界失去了控制，而是世界从未以如此程度受某单一力量的控制。如我们今日所见，这个世界所做的只是撒播、增强了美国体系。在经过国内战略家们的不断修正后，美国意志再清楚不过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如有必要，做出调整以便适应美国的标准和利益。这些目标没有任何非理性之处，它们可以追溯到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和艾奇逊(Acheson)时代。¹⁰当然，无论彼时还是此刻，目标中不排除有误判发生。现在的不同只在于美国拥有更自由的手段来推行这些目标。正是这一点使得向波斯湾、巴尔干、兴都库什(Hindu Kush)等地的一系列军事远征变得

⁸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

⁹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¹⁰ 科德尔·赫尔和迪恩·艾奇逊分别是1933-1944年间和1949-1953年间美国国务卿。

徒劳无功，而美索不达米亚无疑是当下的例证。

关于这些问题，霍布斯鲍姆的立场从未动摇。在西方的国内政策方面，他的本能通常远非激进：他会克林顿失望，判定德国财政部长拉方丹(Lafontaine)远离左派，并且对金融市场没有将新工党视为一种威胁感到惊讶。¹¹不过在国际领域，霍氏思想背景中的另一种元素则占了上风。过去十年中，霍氏的国际视域几乎从未有任何向白劳德¹²倾斜的迹象，经典列宁主义思维丝毫未变。他否定波斯湾战争，粗率地对意大利记者说巴尔干战争不是人道主义干预，将阿富汗行动比作早期英帝国对该地域的轰炸，并且严厉斥责反恐战争以及随之而来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在霍布斯鲍姆之外，我们很难想到任何一位拥有同等地位的英国知识分子能拥有如此忠诚的记录。

相比国内政治局势，当今时代帝国主义公开地复活的企图要远为重要，由此，霍布斯鲍姆在这里所划界限的价值就变得鲜明起来。不过，《极端的年代》还为我们另外上了更有价值的一课。历史上的政治失败几乎不可避免地导向对失败之外积极意义的寻求。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左派知识分子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种思想上的反应有两个标准步骤，两者在霍布斯鲍姆那里都得到了突出表现：对胜者的体系进行重新命名以使它变得更受欢迎，同时夸大其胜利中的裂痕以使它显得更加脆弱。无论哪种情况，其隐含的动机是一样的：对现存体系任何有效的反抗必须以从该体系中解脱出来的可期前景为前提，而如果体系的一致性和力量不受控制，唯一的后果只能是我们以某种方式接受它。这无疑是错误的。对敌人的准确认识要远比激起无端的猜测更有价值。不在安慰中找理由的对抗要永远比那些依靠安慰的对抗更有力量。

这种反思丝毫不会影响《极端的年代》一书的伟大。这部书如同一座宫殿，建筑师在修建它的时候改变了计划，由此带来的结构上的不一致使它变得奇怪，不过宫殿依然壮丽，和它初看上去没有丝毫改变，宫殿的每个房间都挂满了画作，画作的风格或许不同，但每一幅都有它奇妙的魅力，其中许多都是一流的杰作。如同任何一座艺术博物馆，我们不可能一夕之间欣赏它的全部：我们需要一遍遍地重访。《极端的年代》远非平和，而艺术只有当激起争论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只能秉持霍布斯鲍姆本人的精神来解读他留给我们的庞大遗产，带着同样的温暖、激情和敏锐。

¹¹ 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 1943-)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领导人之一，后退出该党成立德国左派党(Die Link)。他在1998-1999年间任德国联邦财政部长。

¹² 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 1891-1973)，1930-1945年间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两次代表美国共产党竞选美国总统。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他提出“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跟着罗斯福走，一切服从罗斯福”等口号，后在1944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开始宣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存”思想，并在当年美共12大上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1945年威廉·福斯特等人宣布重建美共，并解除了白劳德的职务，次年将其开除出党。

秃头青春

万夏

第七章

1982，春天

—

如果现在不是立着，我就要一睡不醒死过去，梦中她细挑的眼睛一直闪烁到天亮。很多天没有见了，满脑袋闪耀着的莎姐姐快要胀破梦想的香蕉皮。给她写了一首诗，誊抄在几页半透明的糯米糖纸上，作为再见的礼物。

昨夜的酒喝得太快、太猛了，像在吃奶。还在宿醉的上午，路过红卫兵花园，被稀里糊涂拉到停在路边的采血车里献了一百西西的鲜血。那该死的采血员也没闻到这个人满身酒气，接受这瓶酒血的倒霉蛋不打麻药就会醉翻在手术台上。

小雨还在下，滴在一枚比雨水还冰冷的指环上面。走在去阶梯教室的路上，找到莎莎，然后说声拜拜。暮色和着细雨又降下来了，和昨夜的残酒一起，进入到我身体最深、最黑暗的地方，混搭成了无限的困倦，让我随时倒下去就可以深深地熟睡，旧梦里那些隐隐的痛感变得甜蜜和清晰。

几天前的一个中午，曾广谦的二哥“老臭”曾小明找来了。和这外号一样难猜，他的大哥叫“牛脑壳”。老臭在成都省上计划生育委员会当司机，一见面就说你们南充野蛮得很，是计生的重灾区，到处都在乱下蛋，这不，地方上正举办计划生育周末对付，省里调了一大卡车的避孕套前来支援。“你知道这一卡车有多少吗？每小盒12个，每箱近700个，我这卡车装了两百箱，十多万个啊！想想什么概念，你们这鸟城，人口不足二十万，女的还占多数，就从今晚起，集体性把硬得起来的鸡巴一次性全套上，你们一个星期也用不完啊！嗨嗨。”老臭老说这地方是‘你们的，你们的’，他忘了，我才到此地上学一年多，才十九岁，这南充怎么就成了我们的呢？

中午食堂吃抄手，我们一人打了一碗。老臭皱着眉头放下筷子，“这馅有些不新鲜，好像有些臭哦。”我嘿嘿一笑，“你哥子怪不得叫‘老臭’，太挑剔了。这抄手的肉日妈的可能没搞好，确实是有点骚哄哄的，将就吧。”两个边骂食堂边嚼大蒜，连碗里的汤也喝光了。

他的一辆北京130大货车就停在学院大门口的路边上，我这才发现大门右边的空地上，搭了一大排席棚，下面有七八个写字桌拼成的台子，上面堆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计生用品的纸盒。类似“乱生可耻，计生光荣”、“管住你的下半身，就是管住祖国的未来”几条非常扎眼的横幅扯在棚子上面和大门旁的墙上，两幅真人大小的男女生殖器的剖面图悬挂在很显眼的位置。

“老臭”爬上他的货车箱，掀开遮盖的帆布，从一大堆箱子里很粗暴地撕开一只，“彩色新型的，各种颜色都有，你就拿点去用吧。”伸手从里面抓出七八个小盒子，扔给我。“得赶紧去卸货，晚上还要赶回成都。”

这粗糙的牛皮纸盒里有十二只青岛橡胶厂生产的彩色避孕套，这套子的皮差

不多和橡胶手套的指套一般厚，粉、橙、黄、绿、青、紫六色一套，一盒有两套，用一个加了油的塑料袋子封着，一大串提在手上，就像节日里公园门口小贩手里那些没吹胀的气球皮皮。

回到宿舍，长安抢了一只蓝色的，粉的给了邓班长，两个土包子好像从没见过这彩色的洋玩意儿，我说是氢气球，吹吧。

皮皮太厚了，真的和橡胶手套差不多，两人费出吃奶的劲才吹出脑袋大小的气球来，喜气洋洋地挂在他们的蚊帐上，邓班长用手指弹着气球顶上鼓鼓的小头头骂骂咧咧，“就你狗日的硬，吹不醒。”

我忍住不笑，发现他两个嘴唇上，染着淡淡的蓝色和红色，这皮套套一沾水就脱色了。这褪色一直褪到前天晚上。一大早，想挑了两个有梦幻色彩的紫色去浪漫一番的杨帆，见了我就抱怨“这东西染的什么啊？蛋蛋都乌涂涂的了，小维怪罪我，晚上我们没喝酒吧，怎么枕头上滴的有通化葡萄酒呢？”

两天了，大门口那些计生摊子，异常冷清，摊子后面的工作人员几乎整天都趴在一个真人大小的男女交媾模型旁边打瞌睡。这教学模型只是一个屁股前后的局部剖面，塑料的，但居然能动，男女可单独分开摆设，也可合二为一。这可能是普天下几十年来的第一次，而且在这个稀缺火车的蛮荒地方，女人都是看着男人的针灸模型意淫，男人最多能在维纳斯石膏像前打手虫。

进进出出大门的师生都很多，但却不朝这边正眼看。有些胆大的跑到摊子前，从盒子里拿出些东西翻弄一下，仔细打开的时候仿佛被烫伤了手指，赶忙一扔，仓皇皇逃开了。前天我到这宣传摊逛了一次，只要你出示学生证，摊子上的所有东西都一律免费领取，几乎不限数量。这真令我欣喜若狂，一家免费的医药公司突然掉到你跟前。

我拿一张报纸，胳膊下夹一本书作掩护，晃到这个局部模型前打望，台子后面一个烫爆炸头、眼镜下面有麻子、穿着白大褂的胖女人站了起来，像这座性交模型的守护神，直盯盯看着我这个比她自己还怪模怪样的家伙。我没理她，弯腰仔细观察这个我有生第一次看见自己以外的交合形象，就像小恐龙第一次看见外星人那样新奇。

这个半剖面的教学模型，男的鸡鸡上就只戴了个套子，另一半女的穿戴既很丰富又很陌生，子宫里有金属环，子宫外有一顶小帽子，小帽子外面有一团搓皱的糖纸，几只大大小小的药瓶放在模型边上。

我抽空又来摊子上跳了两次丰收舞，直到把我柜子的右边抽屉塞得快爆仓了。

在过后的两天里，上英语课，我照例坐在第一排崇拜美丽的陈红老师，陈老师捧书的手就在我的头上晃动，我的眼珠猛地掉了出来：真不敢相信，陈红老师左手的拇指上居然也带了一个金属环，和我手上戴的一模一样，银光闪闪，和几只涂了油的淡淡透明的指甲相映光辉。我不敢肯定这是敖哥送她的，但这和我手上的一样，不锈钢的避孕环，从有润滑油的塑料小袋挤出来，双手一捏，噗地弹向空中。

那天在烫爆炸头的白大褂面前，我足足要了一打半揣在身上。极细的不锈钢丝绕成圆珠笔芯粗细的圈子，弹性十足，这枚将抛投在女人子宫中深潜的金属恶魔，一个人造的吸食性命的吸血鬼，正紧紧缠套在拇指上，能感觉到心脏在指尖上跳荡。我这辈子听说过的戒指比见过的多，就连我妈妈爸爸好像都没有戴过，只偶尔在老年人手上见过一些最简单的银的铜的，金的绝无仅有。我们全院三千师生，六千只手三万个指头伸出来，可能穷得连一枚戒指都找不到。但现在，当

我举起左手，一只闪亮的银环戴在手指上，显得洋洋得意。

一旦有人问我这是啥东西，我都一股脑地推荐：这些时髦玩意儿，女的戴了是瘦身圈圈，男的戴了更是提神醒脑，生精固本。结果被男男女女请了十多枚出去，反正免费，大家都非要不可。最有成就感的是昨天上现代文学的大课，我从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看到周教授他老人家的左手拇指上，亮闪闪的指环光芒盖过了他嘴里念出来的鲁迅，我暗暗一笑，猜这枚肯定是毛毛送的。

真的很过瘾，真希望校园里这些星星点点到处闪耀的银光，成为大家心心相印的暗号。何院长、邓书记、杨老师手上也应该人手一枚，在每年全院的训导大会上竞相夺目呢！

我给莎莎写了一首绝交诗，按照她的习惯，我得抄在一张纸上念给她听，这首小诗，就在我胸前的衣兜里，抄在薄薄的一小册子里。

这小小的避孕膜本子，我在大门的计生摊子上拿了几十本，一大摞。它像一个洋气的书签合订在一起。两张像熟宣样的白纸，夹着一张半透明散发着蜜饯味的能杀死精子的药膜。每本十张，每张薄得像糯米糖纸，撕下这张糯米纸，搓成一团。小心了，在推塞进去之前，手指千万不能弄湿，不然它马上像糖衣一样就融化了，沾得满指头都是。这张甜蜜的薄膜完全是爱情最具诗意化的悖论：我能抓起一把冰雪，送进火焰熊熊的炉口深处吗？干柴烈火，我的手既不被烫伤，冰雪又不允许融化？

我感觉发现在夹住药膜的纸上写字很有份儿：像熟宣纸，微微有点浸墨晕染。在书签这么大的纸头上抄上诗歌也许很有意思，我试写了一首，共三十多行，横着誊抄。每页四五行。抄完一本，一页一页拿在手上翻看，诗歌的某个句子的墨迹还隐约印在了灰色的药膜上。这个发明真的令人兴奋，每本爱情诗签的封面上，还有厚一点胶版纸印着天蓝色的图案，封底居然还有白底黑字的使用说明书，我就把这个诗歌药签，赶快推荐给了周围写诗的家伙。

我要赶紧见到莎姐姐，幻想我一读完这首诗，就把有好句子的那页撕下来，轻搓成一团，小心翼翼地揉进她的裙子下面，一句一句，一页一页，诗歌不仅播放在空气中，更在她身体的最深处，一个词语接一个词语像雪一样融化掉，静悄悄地等在幽暗之中狙击我的生命。第二天也许春光明媚的时候，她走过操场，我在很远的地方看见阳光透过她的裙子，阴影里充满了快乐和诗意。

昨天早上，梦幻就破灭了，朱智勇跑来骂了我一顿，这东西太烂了。他一天一夜没睡觉，硬是鼓动唇舌把莺莺从陈哥身边砍来下来，连手都没摸一下。那晚他们第一次，那莺莺已是春水滚滚了，他怎么也把诗签塞不进去，兵荒马乱中，莺莺倒是自己拉开裤子，撕下来几页给了自己填了。

半个月后，我随手用这诗签写信和抄诗寄给了合肥科技大的老同学杨光，与他一起写诗的叶流传回信了，居然提议用这爱情诗笺抄几首诗去给刊物投稿。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即使不采用你的诗，编辑们自己也可以顺使用用这些糖纸啊！这主意让人听了后快活极了，我用了三本药膜诗签抄了三首，分别寄给了贵州的《山花》、北京的《诗刊》和成都的《星星》诗刊编辑部。

北京真的很单纯。许多天后，只有《诗刊》回信了。

每次我都以为自己很聪明了，真的很愚蠢！以为女人会爱上她天天看见的那个男人。在这个蠢蠢欲动的季节里，她的样子小丑小丑，怪怪的。眼睛细小，鼻子收敛得很正，下面的右嘴角有点歪。皮肤泛着淡淡的烟白，老是朝我飞眼，整整几个小时，我越来越喜欢她低头望着自己大腿的神态，我猜她心里总在提问，或装点什么进去。去卫生间回来，瞥见她微微扭曲的腰姿和叠在一起的小腿，真的很美妙。

最早在阶梯教室看见的莎姐姐成了一张样子定格的模板。除了期末考试，我几乎从来不上晚自习。夜晚多么美妙啊，我们的生命都是从黑暗降临的时候开始的。几天没见她的影子了，知道她在躲我。今晚必须到几个教室去把她翻出来，堵在门口，大声呵斥一顿，说声拜拜，然后绝尘而去。想一想这个过程，都觉得快活过瘾。来到裁缝摊子门口，胡玉和小弟娃气喘吁吁堵住我，样子神秘兮兮。找半天了，那场吹嘘了好些日子的黑灯舞会今晚就可以开场，几个女子今天都搞定约来了，地方就在下半城。

我想把莎莎叫去，这两个人不由我分说，拉着我来到了大门口，“别提你那个沙奶奶啦，让我们尽情玩粗野点吧！”

春雨淅淅沥沥，在灯光里千丝万缕，夜色蒙了一层尼龙纱帘。大门外的计划生育展览的标语横幅泡在雨水。我看了看套在我手上的指环，正闪着银色冰冷的光。

石方穿双火箭皮鞋，下面铆了二十几个铁鞋钉，一走路就把地面敲得“嘀嗒嘀嗒”地响，老远就能听到，碰上路上的石子偶尔还要溅出火星。他斜提着一只三洋双喇叭的录音机，和几个留长发和耳发人已等在那里了，几盘磁带把他牛仔布飞行服的几个兜胀得鼓鼓囊囊。小弟娃提了两个大塑料袋，装着几瓶酒和从学生食堂买的一些吃的。一个烫着钢丝头的女孩站在录音机旁边，灯光下穿一双红得发暗的漆皮鞋，石方介绍着这就是全城有名的飞妹。她的身边是一个穿红色布面梭跟鞋的小伙子，留着耳发，脏兮兮的一年没洗的喇叭裤，裤脚比大门的地面上还污，拖在淌着雨水的地上。录音机开着，好像正在唱邓丽君的《微风细雨》。

下半城是一座伤心的老城区。她太老了，下半城的人民还在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市政府带他们去成都参观火车，飞妹家的房子正中间居然还有一个猪圈养着一头大白猪。

穿过嘉陵江的老马路，雨雾中弥漫着蝉蛹和剥茧缫丝的臊味。全城缫丝厂和印染厂的工人几乎都住在这里，灰压压一大片老瓦房和棚户。

在这条名叫火麻巷的最深处，板板门，一扇拴着，一扇可以吱呀推开。一进门，就猛然吞了一只活生生的打屁虫下去，忍住被臭味激出的眼泪，噎在门口半天回不过神来。

几间瓦房围着一个天井，旁边一眼下水的阴沟，没有自来水管，只有一个水池，水从巷口的自来水桩上挑回来。整条巷子都担水吃，一分钱一担。自来水桩的旁边有一口不加盖的水井，自古就免费。边上靠着一根竹竿连着水桶，要自己弓着腰蹶屁股从深井里把水提上来。

天井旁边搭了一个棚子，里面是一个又深又黑的粪坑。粪坑上面搭了板子围成一个圈，里面养了一个大白猪。猪圈的旁边搭了两张厚木板，成了厕所。蹲在这茅坑上，屁股下面是一个充满沼气的深渊，让人一辈子都会在噩梦里掉进去。你正在爽，一抬头，那养得滚圆的猪猪长着长长的睫毛，细细上挑的眼睛像涂了眼影一般一抹灰色，凝视你的时候还不忘朝你眨两下眼睛。

临街的窗子关得很紧，窗帘也早早放下了。飞妹一家都在丝厂，这几天都是

夜班。我把房子里唯一的一盏灯用张报纸做了个简单的灯罩，把本来就昏暗的光线变得仅比黑暗亮一点点。灯光下面，一张四方桌，有几只玻璃杯子，倒了汽酒，一瓶绿豆烧酒打开没人喝，几个碗里摆了从学生食堂买来的凉菜和一只卤鸭子。

桌上的主角是玉子娃的一部三洋牌两喇叭录音机正照例播放的邓丽君。没有邓丽君，就没有音乐，录音机就不会存在。一个最标准的黑灯舞会伴随着欲望在每个人放大的瞳孔里正慢慢点燃。日妈笛，只能是黑灯，找不到更大一点的灯泡，不然巷口总闸上的保险丝老是断掉。

寒假后一开学，学校就贴了校告，对学生的着装和娱乐作了具体规定。其中有几条：“不得穿牛仔裤、喇叭裤，不得穿紧、露、透的服装。”“不得开黑灯舞会。”“集体开舞会须得系一级领导批准。”“不得跳流氓舞（摇摆舞、迪斯科舞）。”“不得播放港台靡靡之音（邓丽君等，曲目详见规定）。”告示旁边贴了一张禁播的港台“反动、黄色歌曲自查目录”，邓丽君的一半和刘文正的全部在上面。

张山推门进来，这丫头脸上的雀斑看不见了，剪个运动短发，她是我们校车队长的女儿，在学校后面的市射击队当队员，喜欢和石方他们鬼混，经常扛着小口径步枪，带领我们在校园里和田间地头到处打鸟鸟。

我的心一直在等待。几碗酒下去，几支舞曲也完了。雨好像越下越大，屋檐水嘀嗒嘀嗒下着，好像有人在轻轻敲门。

蓝袜子来了。进门的时候外面有人在探头探脑。

磁带换了一盘，迪斯科开始了，一曲最流行的《我的心上人》，接着是《单程车票》。录音机的声音几乎开到了头。每个人的身体都在剧烈地摇摆。我开始在倒满汽酒的杯子里掺上更烈的绿豆烧，每个跳到桌边的人都端起来很猛地闷一大口。我又开始了拿手戏，边跳舞边用嘴叼住杯子的边沿，一仰头把一只杯子几乎倒扣在鼻子上，半杯酒全干掉了，一手夹着烟，一手还拿着另一只酒杯。

我闻到热烘烘的汗味从领口下面蒸腾起来，酸酢酢骚乎乎的，混合着屋子的酒味和猪圈味，飞妹和张山身上今晚都洒了香水，闻起来和香皂差不多。

只有蓝袜子身上不香。

她一进来，屋里的气氛就改变了，昏暗里有一团光晕围绕在她的身上，就像去年夏天我第一次在大街上见到她那样，炙热阳光下的午后，大街上空无一人，她迎面走来，一圈淡蓝色的光晕罩在她身上。米白色的连衣裙，安静的面孔，直视的眼睛，一个女神从我身边飘过。她太美了，我简直不敢回头看她。

我搂着她跳了两曲邓丽君。一直轻轻搂着她的腰。她一直等我说话，我只是轻轻把鼻子凑到她的头发里，闻着淡淡的香波味道。我知道今晚是为她来到下半城的。

她的左腰里有个圆鼓鼓的东西，老硌着我的手。我忍不住问她。

她停下舞步，从后腰摸出一截东西，一摁，昏暗中一道雪亮的光束照在天花板上。竟然是一只手电筒，我的天！

“这是男朋友送我的礼物。”蓝袜子晃着手里的电筒。说男朋友的爸爸是她们丝厂的厂长，能租借一辆“飞鸽”自行车，下夜班可以照顾送她回家。她的家过河还要再走几里地的田坎。路上拿个手电方便些。

“出来约会跳舞，还要别个手电筒？”我恶作剧地问，“是不是刚把家里的猪草打完，放下背篋就赶来了，连手都没洗一下？”“嗯，是他用自行车搭过来的。”

我一把搂过她的身子，把鼻子凑在她的肩膀上使劲闻了闻，倒是有股青草香味。一抬头，光晕不见了，站在我眼前的就只有一个厂里的丝妹。

门外有些嘈杂声，好像有人在用力敲门。飞妹把门打开出去了，我撩开窗帘看出去，在隐隐的灯光下面，巷子里站了很多人，样子都很激动，飞妹正和他们争吵什么。

飞妹甩门进来，大声嚷嚷，“什么二十五瓦，明明这灯就是十五瓦嘛！”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居民因为没有其他电器可用，每户核定的标准以灯泡的瓦数来缴电费。一整条火麻巷只有一个电表，如果超标，多余的电费就要由其他人家来分摊。

这时门外的吵闹声更大了，有人使劲踹门，飞妹打开门，有两个人探头想使劲挤进来。飞妹挡在门口，放了一个进来，那人嘴里一边嚷嚷“你们家用电就是比别人凶”，一边一窜就到了灯泡下面，踮起脚尖，虚起眼睛死命地看那灯泡上的字迹，他张大的嘴巴久久合不上。

“看准些，十五瓦吧，宝气！”飞妹恼羞成怒，和耳发青年一起把这人架起来往外推。这小子一直扭着头，死死盯着灯泡，就在被推出门的一刻，突然发现什么，大声叫起来“收录机，收录机，收录机插头！”众人回头一看，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录音机的插头果然接在灯泡上的一个转接插座上。

被踢出门的家伙在外面发疯一样大吼，“他们用录音机偷电！录音机偷电啊！”街上的嘈杂声突然停了，几乎是死一般的寂静，屋檐水在嘀嗒嘀嗒响动。

一波密集的砖头瓦块像一阵排炮的齐射，从窗子飞了进来，哗哗啦啦的玻璃声和屋子里的乒乒乓乓响成一片，昏暗窄小的房子顿时被炸开了花。一伙人惊魂未定，第二波像狂风暴雨，更为密集和猛烈，更大的砖头从破碎的窗口飞了进来，咚咚咚地砸在墙上，一阵人仰马翻过后，有人大喊受伤了，黑暗中有人哇哇大叫。

有人死死拉住我的衣服，我回头，是蓝袜子一张吓得变形了的脸。

街上吼叫声一片，砖头瓦块还在乱飞，外面的人好像要冲进来，开始使劲撞门。三个南充崽儿聚在一起急急说了几句话，就见那个穿喇叭裤的崽儿从腰间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一个从灶台上操起一把菜刀，另一个提了两个空汽酒瓶子冲到门口，回头冲飞妹吼道“我们杀前头，你们赶紧跟在后面”。

所有人都被这阵砖头暴雨震晕了，还没回过神来，三个人猛地拉开门，在一声震裂耳鼓的喊杀声中冲了出去，那把菜刀在幽暗的灯光下忽闪出一道寒冷的光。

昏暗中的巷子里，一片激烈的打斗声中夹杂着鬼哭狼嚎的惨叫。飞妹带着哭腔求我们“跑吧，不然肯定要被打死在这儿，这是条死巷子啊”。石方是学院拳击队的队长，自恃能操扁挂，骂了一声，拉着飞妹冲出去了，小弟娃抓了个脸盆扣在脑袋上紧紧跟着。玉子娃双手挥着一把凳子“万哥，闪吧。冲出去打死他们狗日的”。他每天在六楼的阳台上举哑铃、甩石锁，把两个胳膊肌肉练得非鸡巴粗，天天在找架打。

我从大门望出去，在几乎没有路灯的昏暗雨中，看不清有多少人在巷子里厮杀成一片。我和蓝袜子拉不住玉子娃，“别出去，你不识路，要被他们砍成肉坨坨”。

胡玉眼早红了，把凳子一舞，一咬牙冲进了雨里。

屋子里空空荡荡，就剩下干壳皮、蓝袜子和我。雨水从门口和破窗子飘进来，我脑袋一片空白，浑身在瑟瑟发抖，抓住蓝袜子的手都捏出了一把汗。干壳皮一脸刷白，缩在一个角落里。

这丝妹死死拉住我，“千万别走，就待在这里，他们不敢在屋子里杀人”。我稍稍冷静下来，给干壳皮挥手，“别跑，别跑，认不得路，外面到处都是陷阱”。

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石方。一张脸被打成了熊猫。上衣没有了，赤裸裸的上身血迹斑斑，一个人抓着他的皮带，一个人勒住他的脖子。“那女娃子跑了，你娃还想跑！”

第二个被押进门的是打成了龟背的小弟娃，然后是胡玉，一个人拧着玉子娃的头发，两个人把他的胳膊反剪在身后。他已经鼻青脸肿，鼻血把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像刚吃了人肉的吸血鬼，有个人还在不停地用脚踹他的屁股。雨水血水和泪水浸满了他的喉咙，就听他在不停地呜咽，“不是我，不是我。别打了”。

屋里跟着涌进了一大堆人，气势汹汹，个个红着眼睛，有人大喊，“不把凶手交出来，就把这房子烧了。”

“凶手？”我几个没逃出去的都倒抽一口冷气，面面相觑。就见人群里又挤进几个人来。走在前面的一个小伙子失声痛哭，“我的手啊，我的手啊”。

这个泪流满面的小伙子左手紧紧握住鲜血淋漓的右手掌，手掌上的小指头齐根没了，鲜血从伤口汩汩流下来，一滴一滴掉在地上。搀扶这小伙子的是个老头，看样子是他爸爸，老头子鼓起眼珠一字一句，“日麻笛，你们偷电，还敢杀人！”他的一个哥哥冲了进来，“找到了，龟儿子找到了，就在路边！”把一根白生生的小手指攥在他满是污泥的掌心里。

三

一群人从派出所押到公安局已是半夜。因事关重大：一群师院的大学生为跳黑灯舞把人的手指头砍断了，而我们这几个人又不承认，打死不买账，派出所只得把我们几个送到市公安局去处理。

市公安局的会议室成了我们的临时审讯室。又是那个左眼仁有点偏斜的周副局长在我们跟前来回踱步，咆哮如雷，“日妈的，不是你们砍的，谁砍的？哎？”几个人底气不足地在小声和他申辩，就见周副局长一脸气愤，言语激烈，仿佛一肚子的新仇旧恨。他每说一句话，尾巴上就带个“日妈的”，整个晚上就听他一个劲地在日妈。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忍不住跳起来，不顾一切大声说道，“周局长，我们都有母亲，放尊重些，不要说脏话。”

周局当头挨了一棒，呆了半晌，左眼只剩了眼白，一甩手，怒冲冲地摔门走了。

扰乱社会治安，拘留七天。

我和石方被带到了拘留所的值班室，一面色黝黑的狱警正背着身子在一张镜子面前刮胡子。一根警棍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转过身笑笑，“搜身检查，把衣服脱了。”那干事喊道，一边习惯性地抽搔左下额的脖子。我和石方都很听话，都把上衣脱得光光的。衣服都扔了一地。

“下面，下面，也脱了，剩个内裤。”干事一手抹着下巴，一手用警棍的一头指着我们的裤子。

裤子脱下来，就剩一个裤衩。石方身上露出了结实的肌肉，屁股上穿条红蓝条纹的花内裤。

两个人赤条条站在灯光下，一阵冷风吹来，身上一阵子鸡皮疙瘩。

“你们就是对面楼上的吧，怎么了？打架？把人砍了？”那干事慢慢走过来，一边把警棍拍打在另一只手掌里，一边抽搔着脖子，他的脖子随着抽动一犟一犟

的，把咬在嘴上的牙齿也给扯歪了。

他盯着石方的裤衩，“嗨，日妈的还是花的哦，打开！”石方愣着，看着他。

“打开！必须检查，不准把违禁东西带进牢房。”干事吼起来，“拉开！”

石方只得把内裤前面拉开，干事探过头，皱着眉头朝里面望了望，“嗯，后面！”石方把内裤后面拉下了，把一个结实的屁股露出来。

“嗯，你。”干事用警棍指着我，等他看完我里面的前后，就把地上的一堆衣裤捡起来。一件一条仔仔细细地捏拿过了，也不叫我们穿上，笑着看着我们。

“记住以后每次说话，前面都要加一句‘报告干事’，晓得不！”

“报告干事，我想屙尿！”石方喊道。

“你学什么的？”干事没理石方。

“我是中文系，他是数学系。”我知道他想问什么。

“要说报告干事。嗯，在文科楼，你住哪层啊？”

“报告干事，就对面六楼，靠里面那排，不朝这边。”我这样回答，想开脱自己，想减轻他对我的恨意。

我和石方蹲在地上，一个红毛过来，拿了个理发推剪给我们剃头。冰凉的推子紧贴着头皮，有一股防锈的机油味道，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一缕接着一缕，黑黑的头发飘落在我脚下，和窗外的夜雨一样无声无息。

小雨还在下，我们趿拉着抽去了鞋带的鞋子，抱着一堆没有皮带的衣裤，只穿个裤衩，冷得浑身发抖。从值班室出来，穿过一个短而昏暗的走道，就来到拘留所的院子里。这院子我早就熟悉了，在对面的楼上几乎每天都要看见它，现在突然走在它的地面上，感觉它陡然变得很宽大很陌生了。

我仰起头，冰冷的雨滴落在脸上。在雨夜里，黑乎乎的文科宿舍楼变得格外高大，仿佛不只六层而是十六层。一排黑洞洞的窗户出奇地整齐，出奇地黑，就在我跟前，紧紧贴着我，它傲慢地耸立在牢房门前，仿佛完全就建在同一个院墙两边的同一个空间里，是同一栋建筑的某个不同附属体。

监狱里服刑的劳改犯白天里帮狱里打杂做事，晚上回号房收监，这种人外号就叫红毛，职位最大的叫大毛子。给我们剃头的老张就是大毛子，在走道里给我们打招呼，“刚才的干事就是这儿的向所长，你们要放明白点。”

院子东边的1号门开了，石方钻了进去。向所长打开宿舍楼正对面靠右的那间，用警棍敲了敲门，指着昏暗的号子里面，大声叫道“上面腾一个位子出来，日妈的，老子先说哈，你几个龟儿子，这个人不准乱来哦，哎！听到没有！”“当！”警棍在门上猛地一敲，所长的眼睛鼓起来，迸出火一般的光芒。脖子和下巴一起在猛烈抽搐，一张扭曲了几转的脸孔悬挂在昏暗的号子门口。

我钻了进去，昏暗中，更昏暗的一些东西不让你看清楚，一阵比恶臭更尖锐更复杂的混搭味道变成了一只长了手脚的东西爬进鼻子和喉咙，我顿时停止了呼吸。

四

我一喝就想喝多，喝多就想一直饮到天亮，一回头，全都翻了。此时此刻，值得再举一杯：即使许多年后，周围的很多人离婚、得晚期癌症、自杀、杀他，又复婚，此情此景，更值得再来一杯。人生莫过如此。

是不是有些堕落了？不到二十岁，见了谁都想打一炮。

阳光从铁栅里射进来的时候，我又醒过来，想到的头两天晚上的那些场景，令我疲倦又伤感。

号门上的饭口“哐当”开了，外面一群人吆吆喝喝“接到，快接到，今天你们七个钵。”七个滚烫装稀饭的铝钵飞快扔了进来，七个馒头，一碗咸菜，一大把筷子。门里的两个人以更快的手脚把这顿饭排放在了炕沿上。“哐当”饭门又关上了。

比这还早一点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门处一阵嘈杂声，“哐”号房门大开，就听外面的人大喊，“快，快。”昏暗中，就见两个影子抬着马桶像短跑的赛手射出门去，又提着空马桶飞快地回来，号房门又“哐当”关上了，我醒来还没揉完眼屎，号子里的人早都起来了。我坐起来，两眼一抹黑，脑袋嗡嗡作响，一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更想不起怎么会在这个臭烘烘的房子里和这些人住在一起。

就见一个人影一蹶一蹶到马桶边，有人用碗在给他倒水洗脸，然后挤牙膏漱口，往马桶里吐水，然后撒泡尿，又一蹶一蹶回到炕上。

号子里有五、六个人，只有这个跛子在洗脸、漱口。

我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头痛得厉害。一群人稀里哗啦吃喝得正香。有人把盛稀饭的铝钵用筷子架了个黑乎乎的馒头推到我面前。我什么也不想吃。

午饭送来的时候，我从号门的饭口望出去，号门外面一大手推车，车上两个大桶，正往每个号子里舀菜送饭。离这车猪狗食不远的大墙边，文科宿舍的二层到六层，整整一大栋楼，就落在我的面前。

我吓了一跳，我的老天爷，每层十六个窗子，每个窗口上都挤满了脑袋，眼光如密密麻麻一场暴雨，刮到了号子的窗口上。全院人民都知道了，跳流氓舞，把人家砍翻了，学院有史以来终于有个家伙关进了隔壁的监狱，多么新鲜，真的养眼啊！大家边拨拉着午饭，边看着下面怎样在喂猪喂狗。

这拘留所就是一个大四合院，北面是学院的隔墙，靠墙西边三间号子，1号、2号和3号，东边三间号房，7号、8号和9号，文科宿舍楼对面的南边三间号房，4号、5号和6号。5号是女号房，4号一半是通往值班室的过道，一半是间单人小号。三厢号房，中间夹个小半个篮球场宽的空地。在学院隔墙下面有一排水泥盥洗台，装有十来个水龙头。旁边有个简易棚子，里面是一个粪坑。每天号子里面的马桶就倒在这里。

四年前学院复课，那时，还没宿舍楼。设计师恐怕根本不知道墙头那边是什么鬼东西，等两年后宿舍修起来，三个年级的男生搬进去，才发现创造了个奇迹，而且是世界性的。我对天发誓，这肯定是这个世界离地狱最近的大学，离文明殿堂距离最短的监狱。修得太绝了：一楼历史系干壳皮的寝室窗户离这道隔墙还不足两米，整个文科楼一层实际上和这该死的监狱的1号间和9号间的距离刚好是一个床铺的距离。二层历史系的周维如果哪天梦游症犯了，从寝室的窗台上搭个两米长的板子，就可以走到监狱的9号房顶上面唱歌跳舞撒尿。很多人在讨论要不要去申请一个吉尼斯纪录？

在开饭的时候，下面的监狱就成了一道好的下饭菜。我从前也常常端着饭盒，有滋有味地看着下面这座正在开饭的院子，手推车上永远只有两个桶，一个装饭，一个盛菜。想象着黑洞洞的号门里那些满是污垢的面孔，以及发生的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那间神秘的女号在深夜常常发出的悲号声，一大碗白米饭也就送下去了，好一顿罪仔捞饭啊！

我的脸上发烧，生怕看见了熟悉的脸孔，赶紧离开窗口退回到角落里。

在整个五十年代，南充师院的前身即为川北行署，胡耀邦还在这里工作了多年，六十年代改为四川师范学院，整个嘉陵路都是学校的地盘，学校大门左边斜对面的市足球场也是学院的体育场。文革中学院停课，学院成了最为闲散的空地。这时市里的公安局系统却在革命风暴中疯狂扩张，从嘉陵路口五星花园左边的市政府里搬了出来，再把学院靠嘉陵路整整一条街的地盘划去一大块。拘留所就在学院和公安局的隔墙边修了简单的几间房子。

这座不足二十万人的古城，把拘留一个月以下的耍奸犯科、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以及有大案要案的临时转运都关在这里。平常关押的人员也就在二三十个左右。

从昨晚到现在，号子里的几个人离得我远远的，那跛子几次想过来套瓷，都有些胆怯，可能是所长打了招呼，或者我虽被剃成了白沙但还不像是个烂贼。中午，号子里的人被文科宿舍那个阵仗吓住了，所有人都以惊异的眼神看着我。

那跛子终于忍不住过来了，一撅屁股，坐在我身边的炕沿上。

这号房不大，比我从前在文科楼上想象的宽敞些。一进号门，是一条有两步宽的走道，再往前就是一个膝盖高、一人多宽、六七步长的一大炕，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通铺。三米多高的房顶上吊着一盏从不熄灭的长明灯。号门的墙顶和对面的墙上开了个报纸大小的没有玻璃的窗，拇指粗的铁条，白天阳光可以从号门对面墙上的那扇窗照进来。

走道左边的尽头放了个比屁股矮一截的大塑料马桶，其实是只装化工产品的大塑料罐。没有盖子，用一张报纸遮着。走道尽头的右边，是一只红色的塑料桶，是号子里全天饮用的开水。盖子上有个白色搪瓷碗，上面也扣个搪瓷碗。旁边的墙上，用水泥板搭了个简单的格子，上面摆了些什么搪瓷碗和肥皂牙刷之类。

那跛子把半个屁股坐在炕沿上，又赶紧起来，到开水桶上把那搪瓷碗端到我面前，把扣住的搪瓷碗揭开，“喝茶，喝茶，上午泡的，有些冷了。”

我接过，“重庆沱茶，我平常也喝这个，来劲啊！”

“我在师院上学，就住这对面楼上，昨晚和人打架，把人砍了。”我知道他们拼命想打听我，还不如干脆说了。

“难怪，中午开饭，这对面楼上好多人啊，吓人，都是来看望你的啊！”跛子的脸开始笑起来。

“把我们拿来示众，吓鸡给猴看。”

“你说砍人进来的？”

“把人的手指头砍断了。”“哦！”跛子抽了口冷气，回头用惊异的眼光望了望号子里那群人。“我叫薛跛子，他们都叫我削脑壳。以后这儿有啥子事就找我。”一回头，“菜包子，让开，睡下一个位子，让大学生挨到我睡。”

我这才发现，在这大通铺上，我的位置是第三个，现在薛跛子要让我往上升一位。这号房的人坐成一排，每个人整天都窝在自己的位置上，几乎不敢走动和说话，从马桶到开水桶的走道上，好像只有这个跛子在一蹶一蹶来来回回，发号施令。

薛跛子来劲了，指着一排人里靠马桶的那边，“第一个，叫马桶，或叫枪兵，专门管这口金鱼缸，来，给大学汇报表演一下，提包贼！”

“马桶”飞快从炕上跳到马桶边，一个立正，站得笔挺；一个雷锋式双手端枪的姿势，嘴里大声朗诵道：

“手握冲锋枪

保卫金鱼缸
宁愿金鱼不产籽
也要金鱼永不死。”

所有人都在大笑，我问“什么金鱼啊？”

笑声更厉害了，“等你多吃几顿老南瓜和咪儿红苕，你就知道屙出来的东西什么是‘金鱼’了”。哈哈，大家的笑声很猖狂。

“我们这是按先来后到从下往上一级长上去，老规矩，只有你大学破例。”薛跛子指着第二个人“抹桌布”，“这个扛鼎（撬保险柜）的每天三顿饭后负责把这走道地面擦干净。”说完，抬起脚让我看。我看到所有人的鞋子都整齐摆放在墙边，跛子穿了双白袜子，让我看他的袜底，我睁大眼睛，日麻笛，居然一尘不染。

跛子有些得意了，指着下一个，“这个‘博士’学位没你高，小学老师，负责打开水、泡茶、洗脸、漱口。你如果累了，他还负责按头、揉脚、提皮、刮痧。”说完朝那个人喊，“眼镜，过来，给大学按按头，我看他这两天浑浊浊的肯定喝多了”。

一个瘦高个从炕上蹭过来，虚眯着近视眼睛，跪在我后面的炕上，十个手指头扣住我的脑袋，两个拇指朝太阳穴一摁。

“这个是菜包子，”跛子指着刚才被降了一级的家伙，“这个摆赌摊压宝的崽儿负责三顿送饭送菜，还有小灶。”跛子指着开水桶边的水泥格子，那上面有一些瓶瓶罐罐，还有两三个对扣的搪瓷碗。

“奢侈啊，还有小灶？”跛子听我问，越来越得意，拉我到水泥格子边，揭开一个碗，“午餐肉。”又揭开一个碗，“炸干猫鱼。”第三个碗慢慢揭开，是半碗糖水桃子。“黄桃的。”

看见我目瞪口呆，跛子乘胜追击，指着两三个小搪瓷缸，“油辣子和咸泡菜，嘿嘿。”

“哦，忘了，”跛子指着中间一个人，“虱子，过来，摸包包的！这是我们的放牛娃和饲养员。”一个矮个的白胖子过来，“把我们养的宠物给大学看看。”跛子指着胖子的肚子。

小胖子站在炕沿上，把长裤脱下来，只留条深蓝色的齐腿布内裤，然后把裤腰的松紧带翻开，在里面使劲找东西，“嗯，这儿有两个。”小胖子松了口气。

我仔细一看，翻开的裤腰缝里，有两个向日葵瓜子仁大小的东西在蠢蠢蠕动，跛子上前，熟练地捏起一只，用两个大拇指甲相对轻轻一挤，“啪”一声微小地爆炸，鲜血飞溅了出来，染红了指甲盖，他赶紧放到嘴里，嘘嘘地吸着，像尝到世间最甘甜的美味，微闭着眼睛在回味。

“要不要尝一尝啊！甜的哦”，跛子挑衅地看着正在恶心的我。

“还有，那几个尖脑壳呢？”小胖子赶紧脱掉内裤，露出浓密的阴毛和几乎没了顶的小鸡巴。“还在，还在。”把一丛毛毛拨开，翻找了几下，一个小黑虫子，整个脑袋栽在皮肉里，半截屁股蹶在外面，几个小腿还在使劲蹬呢。

“我们这里每个都养了几只，大学，你也来领养吧。你不养也得养，那些发下来的公被里面，哪没有这些小动物。”我一听，身上立即开始痒起来。

号子里的饭点和学院一样，中午十一点半，晚上五点半。晚饭后六点半，号子开始点名查号。

从前号子晚间点名，都是干事和红毛进到号子里喊名查对。今晚好像有些改

变。左边石方号子先查房，七八个人全被叫出门，在号房门口外的走道上依次排开，石方被排在靠头的位置上，好让文科宿舍楼上几百个脑袋看个究竟。

石方一亮相，就听见楼上一阵哗然。在一排秃头的人中，大家都在猜谁是石方，文科楼的人几乎都不认识数学系这家伙。

我从窗口望出去，石方埋头拉着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面无表情。

宿舍里的灯都开了，楼上窗口上的脑袋越来越多，好多理科楼和女生院的也来看热闹了，就像楼下的院子里有个写诗的大猩猩和穿双火箭皮鞋的恐龙。号门上叮叮当当、哐哐空空密集地响着，那是整栋楼的人扔下来的眼光，那么多焦灼渴望的眼睛都盼着我出来，我知道的。

三月初的雨天，空气还很冷，号子里的人都穿着棉大衣或厚衣服先出去了。为了证明自己还没有被打倒，像个英雄，绷起，咬咬牙，就只穿了那件绿色的确良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雨还在下，外面一片寂静，仿佛在旷野里突然间失聪了，静得我一阵耳鸣，听得见血液在皮肤下豁豁奔流。干事在挨个念名字，轮到叫“606”，我没反应过来。“606，夏万！”我才反应过来是叫我的号。仓促答应一声“有。”清醒过来，慢慢把头向上摇。

我不知道自己剃光了头是什么样子，只依稀记得小时候遭别人打破了头，被医生剃光了一块，包上纱布。等伤疤好后，再把头发重新剃成一个白沙。在镜子里，大耳朵，白胖胖的脸，像个庙子里的小沙弥，样子单纯而虔诚。

我感觉我的脸上挂着的东西太沉了，脑袋是一个铅球，头不得不低下来，就像在全校的一个现场批斗会上，而且还是关押我监狱的号房门口，教育意义十分重大且深远。我不知究竟是谁终于出了口恶气。

冰凉的雨水滴在脸上，院子的光线昏暗下来，来电了，灯光里文科楼一片明亮。

我坐在昏暗的角落里面，脸上还挂着雨水，鼻涕吸拉着。这世上这时刻我最想见到的人没了影子。我以为能在这一片面孔中能一眼认出来的，尽管隔着一场蒙蒙细雨。

晚上十点过。一阵歌声突然响起，从对面宿舍楼的右边飘来，就是前天晚上飞妹家那盘邓丽君。我一听，就知道是刘亚明那台低音很重的夏普收录机，正架在二楼外语系杨帆寝室的窗台上，直接朝下对着院子播放。

看丝丝小雨，轻飘在窗前

听丝丝小雨，轻轻打在屋檐

心中突然一阵感动，泪水涌上来。我叫号子里的人静静地听，告诉他们，这曲子是为我播放的。薛跛子听了，半信半疑。

歌声戛然而止。我知道，杨帆他们辅导员老刘冲到他们寝室了。

五

去找一双有脚气的家伙，穿一双军用尿水胶鞋，套入一双尼龙袜子，干十天的活不洗脚，然后把他闷在一个夏天的蚊帐里。或晚上去吃两头生大蒜，不准漱口，第二天一早把一张嘴凑到你面前，连说十分钟的话。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

号门的饭口“哐”开了，就听外面有人喊，“削脑壳，加个铺。”

号里的人一下兴奋起来，就听跛子冲着人群喊，“上去，都坐上去，过堂！”

一排人在炕上靠墙刚坐下。号门打开，一个人抱着一堆衣裤，冷飕飕地站在过道上，号房里立即充满了尿水胶鞋和大蒜的味道。

一伙人都不说话，盯着那人。那人心头发虚，手足无措，低头不敢看炕上这帮人。

菜包子发话了，“放到桶子边，啄脑壳，懂事噻！”

那人把一抱东西扔到马桶边，朝着马桶躬身低头。约摸半个时辰，还是菜包子发话：“过来，说，咋个的呢？”

那人挪到炕头边，低着头，“唉，在汽车站，遇到个一根筋的，死活不放手，结果亮刀了，没走脱。”

“捉个现行，这回重了哦，肯定又要上山了。”那人不由自主点点头。“怕啥，吐条的命案嘛，或吐一张熊猫皮，都可以减脱。”“不废话了，规矩懂噻，你是老板凳了。”

“懂！能轻些么？”

“嗯，你自己点菜。”

“整几个酸麻筋算了吧！”

“哪有这么松活。从古到今，里面的规矩，你懂的。再加两个背篛！”

“行。”那人低声说。自动躬下身子，双手垂到脚背上。

菜包子走到那人身边，咬牙切齿高高举起胳膊肘在弓起的背心上使劲“咚咚”两下，那人一下栽倒在地，脸如死灰。

“酸麻筋十个。”坐在一旁的跛子说话了。

那人喘着粗气，好不容易坐在地上，背靠炕壁，把两条腿伸得直直的。“只打一边，行吗。”

小胖子过去，也坐下来和那人成了直角，高高抬起腿，用脚后跟朝伸直的大腿猛地砸下，那人浑身一抖，一咬牙，没敢叫出声，“咚咚”，大腿上十响。那人几乎昏死过去。

中午送饭的时间到了，从石方的1号牢房开始，一个黄色的手推车吱吱嘎嘎推了两个大桶来了，一个桶里是米饭，一个装水煮的白菜，那溜水般的怪味道冲得连文科楼都能闻到。搪瓷碗一瓢饭，一瓢煮白菜，依次递进号门上的活动小门。

那饭菜刚递了几钵，就听见院子中间“噼啪”一声，从对面楼上扔下来一包东西。

监督餐车的干事过去捡起来，是一个扎了口子的塑料袋，里面有两个面包。

那干事一抬头，吓了一跳。

隔壁楼上，几乎每个窗上全是脑袋，朝下张望。那干事提起塑料袋，正想发问“谁扔的”。

“啪”，一只塑料袋又落在了院子里。打饭的红毛赶紧跑去捡起来，交给干事。居然是一块卤牛肉。那个干事提着塑料袋还没反应过来，院子里噼里啪啦一阵响动，塑料袋、纸包扔了下来。干事和红毛像躲冰雹一样躲到房檐下去了。

就听得楼上有人在喊话，“万汤圆、叶子烟（石方）接到。”“送进去，送进去。”红毛从值班室拿了个脸盆，赶紧把落到院子里的东西捡走了。

开晚饭的时候，文科楼再次给拘留所的院子下了一场“暴雨”。监狱的空地上到处是塑料袋和纸包。这次号房送餐的红毛似乎有所准备，拿了个食堂淘洗菜

的大盆子在一边守候。楼上扔多少，他们就捡多少，各个喜笑颜开。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日麻笛，满满一大盆，用送餐的手推车拉走了。

晚饭后的点名，又改回了和从前一样在号房里进行，就今天午饭和晚饭文科宿舍楼这个扔东西的阵仗，怕我和石方在外面露脸，最终会闹出事来。

刚点完名，号子的门开了，我被叫了出去。跟着干事穿过值班室，来到公安局办公区大院，又来到那个充满烟臭的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不仅前几天来过，而且上学期还来过，那次文科楼和监狱冲突起来：半夜里监狱里发出了阵阵惨叫，撕心裂肺的声音划破冬天的夜空。住在二层和三层的政治系和历史系 77、78 级的大男生首先发难，许多人在窗边大喊，“不许打人！”“法西斯！”监狱的值班干事来了，站在院子里对着文科楼指手画脚，声嘶力竭吼着什么。

已是半夜十二点了，宿舍楼早已熄灯了，楼上全部的人马都压在了朝监狱的窗口上，监狱的院子里也来了好些干事、武警和红毛，拿着电警棍和电筒。隔墙两边的人开始大声对骂，像古代两军开仗前叫阵。

只要院子那边一个头样的人朝楼上喊句什么，这边就一阵哄笑，那边急了，用电筒朝上指着，骂骂咧咧威胁。这边楼上几百人一齐喊出“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巨大的喊声冲破夜空，恐怕连红卫兵花园那头的嘉陵江边都能听到。

“砰”，从楼上扔下去的一个暖水瓶在监狱的院子里炸开了，像一声信号，第一波扔过墙去的居然都是拖鞋。紧接着，从楼上下了一场持续十多分钟的狂风暴雨，监狱院子里的人赶紧躲开了。

楼这边一群情绪高昂的人找来了梯子，搭在了墙上，中文系 79 级的一帮人准备冲过去了。

这边院保卫处来了很多人。墙那边武警在号房的屋檐下站成了几排。七八个手电筒朝这边乱射。

这时，有人站在五楼的窗上大喊了一声。

第二天，公安局将文科楼朝楼下狂扔乱砸扔过去的东西就在这个会议室办了一个展览，让学院组织文科楼各系的同学，特别是像我这样有“好动”怀疑的学生，轮流到隔壁去参观自己的战利品。

这会议室不大，满是烟臭味道，到处是痕迹和烟头的烫痕，脏兮兮的，比我们食堂还邋遢。中间也照例放了一张标准的乒乓球桌，桌上吊着两根日光灯，一根一闪一闪，整流器“啪啞”作响。乒乓桌上像小山一样堆着破温水瓶壳、墨水瓶、破砖头、烂鞋子、凳子腿、发霉发硬的面包、馒头，两个日光灯间还吊了个横幅“遵纪守法，做一个文明的好学生”。

大家排着队，轮流进来，围着堆满杂物的乒乓球桌绕场一周，像在给遗体告别。那个左眼有点邪的周局长带了一大队人马在两边夹道相迎，怒目而视。我拖着步子走到桌前，在一大堆垃圾中，立即认出我那有印着牡丹花的暖水瓶，老子刚买的，昨晚就遭刘建平扔颗炸弹一样在下面的院子里开了花。我向毛主席保证，那天局里肯定从垃圾堆里淘了很多宝贝回来充数，因为我发现那堆杂物里竟然有一只生锈的煤油灯和一截水龙头。日麻笛再穷，也没谁提一只破煤油灯上大学晚自习啊！哪个同学上课会在鸡鸡上装个水龙头来控制尿频呢？

比起上次扔下的东西，这回乒乓球桌上的堆头小多了，但也占了半边桌子，几乎全是塑料袋和报纸，每个袋子和纸包包都打开了，有包子、馒头、面包、花

卷、卤牛肉，还有卤猪耳朵、尾巴，有回锅肉，居然还有一份摔得稀巴烂的川北凉粉。我知道这是莎姐姐干的，只有她想得出来。上次吵架翻脸，就是这川北凉粉惹的祸。凡是学生食堂有的菜品，几乎全在这里聚齐了，比上次班里国庆聚会的自助餐还丰盛，日麻笛，就差几瓶酒了。

我正在这桌美食边上吞口水，准备低头认罪。突然发现石方也站在桌子那一边，两手抓着一只卤猪蹄正龇牙咧嘴地啃呢！

会议室里有所长、值班的小巨干事和两个红毛。除了带我来的大毛子老张，其余人的嘴都在大动，咯吱咯吱地嚼东西，所长还拿双筷子伸手在一堆塑料袋里挑肥拣瘦。

所长头也不抬，口齿含混不清，“夏万，看看，看看，不像话，不像话。还读啥子书哟，妈老汉儿的钱都糟蹋了。”一块咸烧白在他手上的筷子上打闪闪。

小巨干事在我的屁股上拍了拍，“整点吧，大学，都是你们楼上的那些同学扔的，太浪费费了。”

回到号子里才真的后悔死了。真是瓜娃子，为了给自己弄个清高不俗的形象，给自己端起，就只把跟前的一个包子吞了，噎得不行，把莎姐姐的一袋稀巴烂的碎凉粉全吃了。

所长问道：“夏万大学，我们打过你没？”“没啊。”我回答。“饿过你饭没？”“号子里那些烂贼整过你没？”“都没啊。”

“那好！你们学院保卫科要你写个东西，告诉你楼上那些同学，要他们不要再三天两头没事扔东西和吵吵闹闹的了。这些都是违法乱纪的，这是政府的监狱！做个好邻居嘛！”

回号房的时候，我提了只塑料袋，鼓囊囊装满东西。“号子里那些人，不准给他们吃哈，就说是家里送的。”小巨干事跟在我后面，“跟你说了，出拘留所没给你上铐子，给你面子了哦！”我走在前，点点头。

“你是不是有把吉他？”突然小巨小声问。我停下步。“嗯。”

小巨凑拢我，“我弟弟就在你们生物系，81级。想学吉他。你，你嘿，能不能过几天出去教他一下。”

我睁大眼睛，“好啊，没问题。叫什么？”

“巨东风。”

嘴里还在回味那碗凉粉的味道，嚼着牙缝里的葱花。二楼刘亚明的录音机响了，邓丽君的《伴你走天涯》，为了你不顾一切来爱我，你说要去走天涯，我将伴你奔走……，伴个锤子天涯，老子就在楼下，孤零零一个人。我坐在炕沿上苦笑。

半夜醒来，肚子痛如刀绞，拉了两次，当班的小巨干事从药箱里弄了几颗黄连素来才稍好些。此夜熏风阵阵，不如病得再厉害一些，去夜色阑珊里兜兜风该多好啊。

我叫喊背心痛，然后胸口又发阵痛、心慌，让薛跛子赶快报告干事。除了值班室里有一个药箱，小巨无可奈何，不能做主，说等天亮吧。我对小巨说，我爸三个月前就刚死于心脏病，我从小就有心脏病史，赶快去检查一下，不然要死人了。小巨给吓住了，打电话给向所长，所长同意马上出去到医院急诊。

我心中一阵窃喜，披上军大衣，坐在红毛推着的后架的自行车的后架上，身子伏住坐垫，双手戴着手铐。小巨跟在后面，“委屈一下，所长说的，一定要戴，不然

不准出门。”

“还怕逃跑啊！老子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国民党，只有三天就满格了，往哪里跑啊！巨干事，你没带枪跟着吧？”

小巨笑笑，“去医专附院。”“你们真的把人家手都砍断了？”

“屁！老子坐在房子的凳子上手指头都没动一下。现想起来，真日麻笛可恨，还不如把那龟儿子鸡巴也给砍了。”我完全忘了在假装心脏病发作，挥舞着双手差点掉下车来。

自行车出公安局大门，往右走两分钟，经过学院大门，远远从大门的铁栏杆看去，教室和宿舍里的灯早熄了，隐隐约约大门边还有人在翻墙回校。“还在翻，老子都翻到隔壁去了。”我在心里骂，望着那门里面长长的发白的道路，路两边黑黢黢的塔柏。我真想冲进去把很多人狂吻一番，再猛扇一阵耳光。但这些人究竟是谁，我已经模模糊糊，有些记不清了。才离开三天。

刚过校门，小巨说“糟了，忙忙慌慌的，只想到带介绍信，忘了带钱包。”我说“不用去医专附院了，到我们学校医院，有急诊。不用钱。拿学生证，说名字就行。”

三个人沿学校的外墙往右，不到五分钟从学院的后门来到校医院。

校医院值班室里还亮着灯，一个老太太正扑在桌子上呼呼大睡。“打开吧。”我把戴铐子的双手举到小巨跟前，小巨犹豫了。

“一个看病的同学半夜戴着手铐干什么啊。”小巨反应过来，赶快打开手铐。

“急诊室没心电图啊，你要白天来。”医生从我胸口上收了听诊筒，“嗯，心律不齐。”我赶紧把听诊筒接住，按在肚子上，“医生，我肚子痛得厉害，拉肚子。”医生在听筒里叽叽咕咕的声音里睁大了眼睛，我知道这是真的，那碗川北凉粉正在肠子里打滑闹鬼呢。

医生皱着眉头拿根温度计，“嗯，不是急性肠炎吧？”我暗暗冷笑。几分钟后我从腋下拿出温度计，悄悄用指头在温度计的金属头上使劲搓几下，那水银柱立刻飙升到三十九度，递给医生。那老太太虚起眼睛一看，大惊失色，“高烧啊，打针，打针。”

我太得意了，就像刚才听心脏一样，只要憋足一分钟的气，我的心脏立即就会捣乱——窦性不齐，期前收缩。

“给我吃点药就好。三天剂量的阿司匹林、心得宁和安定。另外，三天的痢特灵、黄连素和颠茄合剂。”老太太睁大眼睛看着我，“是你在看病还是我在看病啊？都让你说完了。”

“嘿嘿，我以前都是吃这些药。另外再来点高锰酸钾，冲水洗脚。春天来了，脚气严重。”

临出门，老太太不放心，紧跟着，“夏万小同学，心脏和肠胃都不好，你病这么重，回去要喝热水，明天上午你一定要来复诊检查哦！”

老太太刚转身，手铐就戴上了。我对小巨使个鬼脸，“这病是真的吧！”

红毛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的小巨小声说：“把高锰酸钾交给我。说什么烂脚趾丫，老子还不晓得，拿这个好搓火抽烟屁股吧。”

回到号子，滚来滚去睡不着，又坐了两次马桶。这晚胸口居然真的有些隐痛起来。

六

吃完早饭，开始早点名，也是值夜班的干事和白班的干事换班的时候。刘干事带了五六个红毛进来了，号子里的人觉得有些异样。平常早晚点名，一个干事只带两个红毛。

果然，一点完号名，就开始了大搜查。五六个红毛把每床被子、衣服、号子里的昏昏晃晃，连炕席都揭开搜查，还拿了手电筒，在炕洞里来来回回地照射，最后在每个人身上搜查。我感觉我才是他们搜查的主角：从我军大衣的衬里兜里搜出了一封信，其实就是一张字条。我心里一沉，“完蛋了！”刘干事如获至宝，一帮人满意地走了。

一排人蹲在墙角边，这才站起来，惊魂未定。我悄悄对跛子说，我们房里有死耗子。

“日妈的，哪个，弄死他狗日的！”号子门“哐当”开了。“606，夏万，出来。”

我跟着刘干事来到值班室边上一个房间。这是所长的办公室，墙上的像框里有几张发黄的图片。照片里的向所长当兵时年纪轻轻。所长从写字台后面藤椅上站了起来，朝桌前一张有靠背的木椅子努了下嘴。

我裹着一身军大衣，身子僵硬地坐下，所长拿起一包重庆牌烟，自己拿了一支，把烟盒递到我跟前，“来来来，抽一支，知道你们在里面偷吃烟屁股。”说完把火柴给我。

“昨晚怎么了，大呼小叫的，病了？”

“吃了点药，没事了。”我赶紧把烟点燃。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手指甲又长又脏，里面塞满了油腻腻、黑乎乎的东西。

所长找出了个小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一封信给我，信封上写着“对面右边牢房，万夏收”。

“昨天楼上扔下的，看看吧。”我拿来一看，字迹是曾好写的，就一行字，“在里面要好好保重，非常想念你！”我松了一口气。不是从我大衣里搜出的那封。向所把信要了回去，放回信封，“你女朋友吧？”

“不是，就一个好朋友。”

“哎，还费这些神，说些肉麻麻的话，过两天，出去了慢慢说嘛。”向所直盯着看着我，抽着脖子筋，“你是我关过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你们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还在读书就进监狱的家伙。”

“我真的没有砍人。”我有气无力地嗫嚅，被烟呛了一口。

“嗯。还说没有，日妈的那么说冤枉你龟儿子了哦？”

所长这才慢慢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条。我一看，坏了，就是刚才查房搜出的那张。

“说，昨晚谁带给你的？”向所死盯着我，脖子抽搐起来。

“没有谁，前几天进来时就有了。”我小声狡辩起来。后悔死了，昨晚看了过后该马上撕掉啊，舍不得，夜里在号子里掏出来几次读上面的字迹：“千千万万不要说是你砍的。袜子”。就这一句。

今早号子里有人发了水。

“你这是严重违规。不说出是谁，你龟儿子死得惨哦！”向所长的下巴和脖子猛烈地抽搐。

我看见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压着许多飞机和军舰的照片。藤椅后面的墙上，

挂了一张世界地图，旁边是两张发黄的二战太平洋战争历史地图和欧洲战区图。有个像框里是他在一架米格战斗机边上的照片。

所长一张脸都歪了，正待发作。

“米格十九。”

“哦！”所长像被突然闪了尿筋，回头看了一下照片。

“对啊，以前是个飞机机械师，是战斗机，就在你们成都太平寺机场。”他有些沾沾自喜。“你还很专业嘛。”

“米格十七的改进型，那尾翼装在垂直尾翼的根部，在机身尾喷气管上面。”我望着墙上的二战历史地图。“向所，你是喜欢航母还是喜欢战列舰啊？”我把头伸到写字台的玻璃板上，下面压的是些从军事杂志上剪下来的飞机和军舰的彩页。有张战列舰九炮齐射的彩页格外醒目。

“密苏里级的威斯康星号，九门 53 英寸口径的主炮！”我又开始假老练起来，滔滔不绝，拼命想把房间里一触即爆的危险引开。

“对啊，这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号。”所长瞪大眼睛，半天合不上嘴。

“用这张太平洋地图，主要是看航母作战，珍珠港、中途岛、马里亚纳，都用航母上的飞机狂轰对方的航母，欧洲战区海洋地图，就只有看战列舰对阵了。

“嘿，我就喜欢战列舰，大家伙，太过瘾了。我从小看电影《甲午海战》，就想当海军。”所长兴奋地喊道，把一支重庆牌香烟递过来。

“嗯，53 英寸的口径，几乎有一口井这么粗啊，炮弹近一吨重，比一个水桶还粗。”我划燃火柴，喷出一口烟。

“最过瘾的是卑斯麦号对胡德号那次阵仗，德国的王牌战列舰卑斯麦号六门主炮的第一次齐射，冲天的火焰把左舷几乎全覆盖了。一排水桶粗的炮弹呼啸着掠过白色的海浪，飞向大英帝国最为主力的“胡德”号战列舰。想想这个过程吧。”

所长瞪大眼睛，半天说不出话，烟头快烧到手指头了。

“一枚炮弹穿透了‘胡德’舰身，当场将胡德号炸成两段，立即沉没，一千多水兵在冰凉的海水中活下来的不及十个啊。”

“你娃真懂啊！你们上学就教这些？”所长倒抽一口凉气。

“我从初中就订了《航空知识》、《舰船知识》，看了好几年了。”

他又拿出一个塑料袋在桌子上，从里面拿出一个作业练习本大的速写本。一个钢笔，“都是扔下来的，信里说让你画画，什么意思？”

“那是让我人闲了没事画点什么，怕无聊！”

他听说我平常画些毛笔画什么的。“哦。”若有心思点点头。

“你龟儿子运气不好，读书读进牛屁眼儿里头来了，你听说过没有，你们那个大文人鲁迅说过，坐三年牢，胜读十年书。列宁就是坐牢出来的，那南非人曼德拉二十多年了，还在号子里。”

向所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像找到了多年的知音。“哎呀，委屈你大学了。这样吧，这两天白天你就在伙房里干干，晚上回号子”。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桌上那张纸条被揉成一团，抖满了烟灰。

跟着向所长来到拘留所的伙房，显然，伙房里的几个红毛刚才已打好了招呼。

伙房不大，两口比卡车轮胎还大的大铁锅埋在一个和膝盖差不多高的水泥台子上，一个蒸饭，一个炒菜，那锅铲就是一把工地上的平口铁铲。伙房中间放一张巨大的案板，靠边墙上是两口小灶。案板边的破凳子上，一个胖子鼻子里喷着烟，端着一个搪瓷缸喝茶，招招手，让我过去。“就是你啊，大学，看你长得白

白生生的，龟儿子烈哈，吃了火药把人家的手都砍了！我姓梁，就叫我老果果，规矩嘛，不准喝酒，有好吃的在这儿吃完，你几天就出去了，随便帮着做点啥吧。”

除老果果外，还有八九个红毛：两个小灶厨师，四个橙子，三个淘米洗菜的帮杂，都是从省二监狱调来有经验的服刑犯人。这个伙房除给号房里二十多个人早中晚开饭，还负责局里的午饭和晚饭，以及夜间值班人员的夜宵，就中午忙一些，晚上局里的人都下班了。

已是上午十点过了，大伙儿开始忙起。我脱了大衣，穿上一件油渍斑斑的白外套，外面扎着带兜的围腰，瓜兮兮地站在案桌边手足无措。

“大学，这些菜认得不？”老果果揣着个搪瓷缸罐，吹着茶水上的茉莉花瓣，指着菜板上大大小小的筲箕。

“莲花白、红油菜苔、老南瓜、坐凳肉。”

“嗯，这两个呢？”

“红苕藤尖，苦菜苔！”

“咦？你龟儿还认得嘛，以为你们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呢？这些咋个吃嘛？”老果果想为难我一下。

“哦，这个做回锅肉，这个水煮南瓜，起锅时往桶里勾瓢油抓把葱。莲花白炆炒，用白火。”

老果果的搪瓷缸停在了嘴边，白火？”“嗯，苕尖用豆腐乳炒，苦菜苔糊辣块炆，红油菜苔用玻璃炒。”我没理老果果，一口气把案板上的菜都背了一遍。

老果果的茶缸子差点掉在地上，“用玻璃炒？大学，我没听错吧？”

伙房里所有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瞪看着我。“玻璃炒？还用石头炒呢！”一个灶头嘲笑。

“爆炒鹅卵石，也可以啊，一道老菜了。”平平静静地回答。

“爆炒鹅卵石？神经病啊！”“不准乱说话哈，”老果果有些生气了，举手叫停，“刚才那油菜苔儿用玻璃炒，咋个回事？”

“嘿，就是用鱼香味，起锅的时候加点冰糖再上油勾些芡粉，炒好装盘的油菜苔像浇了一层晶亮的琉璃。这做法，好听点叫玻璃菜苔。我十四岁的时候发明的一道菜。”

“没吃过，没吃过。红苕藤尖用豆腐乳炒，倒听说过！”

“嗯，用白豆腐乳、夹江产的最好。虾酱也可以。”

“吔，你娃黯得深哦，跟哪个学的？”“我妈，都是小时候在灶台边看大的。这些都是最普通的家常菜，我们家单位的宿舍，厨房搭了一个大棚子，每家的灶都在里面，一家炒回锅肉，满院子都在吞口水。”

“你刚才说炆莲花白，用白火，啥子意思？”

“就是锅烧红了，倒调料炆锅，再把锅端开灶，放白菜，这种不用火的炒法叫‘白火’。”

“稀奇，稀奇，老子做十年伙头了，第一次，第一次。刘灶，把小灶的火捅开。”老果果放下茶缸，“大学，来、来、来，露一手‘白火’。”我知道，我的假老练又惹祸了。

“从前都是家里柴火的搞法，你这种火太大了，我又不会颠锅。怕不行。”我一动不动。

“不行？你娃搞错没有啊，你的大学在隔壁，这是监狱哈，我是这儿的老大。你这道菜，大话都说出来了，今天你就炒，不然，你娃很惨哦！”老果果鼓起眼

睛，“信不信，老子马上叫人把你送回号子。”

旁边的刘灶头过来，“大学，老大给你面子了，让你上灶，要晓得我们这些都熬了好多年才耍得了这锅铲。算你运气，刚进来就能来这伙房，不信，你问问这几个，求爹爹告奶奶，外面使了好多劲，才进了这伙房，而且还在城里面，不然，山里面有的是石头等你去打。”

我挽起袖子，先把一大盘莲花白用手撕下叶子，把粗杆杆去掉。

“师兄，把火弄大。等会锅燃起来了就帮我端起来，”一个灶头端开锅，把煤火捅开，打开电抽风。那灶上的一窝火，顿时窜了起来。我心里怕极了，从前也在家里的柴火灶上练练。这火太大了，从来没操作过这种餐馆里专门的灶炉。

我用一个小碗，糖、醋、酱油、盐、味精调了半碗，然后放点白酒，摆在灶头边，火苗呼呼地窜起来。那口锅烫了，一勺冷油，洗一遍锅底后再把余油倒回油盆。整个伙房的人就站在我的身后，像一群穿着白衣服的行刑队，我一旦灶头失手，可能被宰了放上红辣椒一起给爆炒了。

看见我用冷油涮锅底，老果果和两个灶头都不由自主赞许地点点头。

那口铁锅在灶火上烧得快红了，烤得我的脸发烫，一瓢油，扔进一把切成指甲大的干红辣椒。那红辣椒在滚烫的油里炸成了深棕色，满锅都在冒青烟，整个伙房充满了呛杀人的辛辣味。

看看快燃起来，我把一碗调合倒在锅里，那灶头立即“轰”地炸开了，先是一股白气，然后一团火焰从锅里窜起，直冲天花板。

本来是让灶头来帮我端锅，但来不及了，我用手里的湿抹布握住锅耳朵一端，将一锅烈火挪开了灶头，乘锅里还在翻江倒海，赶紧把莲花白倒进去，在“哗”的油爆声中，一阵猛铲，一道白菜倒像一枚掉在盘子里的炮弹，冒着青烟，滋滋响着端到了案桌上。

老果果的筷子早就等不及了，夹起一块，吹了一下，慢慢放进嘴里。表情停住了。所有人都停止了呼吸，我更是把两颗鸡蛋提到了喉咙上。

“我日麻笛。”老果果骂了一句，什么也没说，又往嘴里夹了一块。

后面一群人个个冲上来，伸出筷子，一大盘莲花白很快没了。“好吃，脆得好，嫩得好。”

“我老妈说，这盘菜的全部功夫，都是在薄薄的一片的菜叶的里外。外面，烫嘴进味，但里面却是冷的，生的，这样才脆嫩，所以做这菜，只有把锅烧红了，然后端开火。这做菜有猛火、大火、中火、文火，这没有火的，我给这火取了一名，叫‘白火’。所以这道菜也叫‘白火炆莲白’嘿嘿，两个白字押韵好记”。

“白伙食哦（吃闲饭）。大学，你娃黯得深！”老果果意味深长。

“让你在伙房打杂，真可惜你了。这样，你来掌两天灶吧！”

“千万不，千万不，我不会颠锅啊，就打打杂吧。”

“颠个卵锅，你就这样炒，让刘灶头在旁边帮你。”

“老大，炒菜可以，但耽误给号子送饭。”

“别去了，他们把你拿去示众，丢你的人。我去打个招呼。”老果果一拍胸口。“说你妈个半天，你油菜苔拿玻璃咋炒呢？”

和学生食堂一样，十一点半伙房开饭。公安局食堂门口的小黑板上，我拿粉笔用工整的颜体字写下：

今日供应：

黄凉粉炒回锅肉 2角5分

白火炆莲白 5分

玻璃油菜苔 5分

老南瓜鸭血汤

我后来根本没上灶，闲在一边指指点点，中午伙食团的灶头上围满了人，都来看热闹，太新鲜了，看看这辈子头次听说的菜是怎样出锅的。人群中周局长也挤进来了，拨开人群，筷子敲着个铝饭盒，“哟！换灶头了嗦？梁胖娃呢？菜的名字取得怪头怪脑的，都是些啥子东西哦？”

老果果见周局叫自己的名字，赶紧过来，脑袋啄得很低，“没有，局长，都是平常的菜，只是做法变了一下，名字叫好听一点，让大家尝尝新鲜。”

“鬼头鬼脑的，好吃，做得可以嘛！”周局笑着说，左眼珠挪到了正点上。我躲在角落里，也低下脑袋，不让大家注意。

中午忙完，大家才围在案板边开始吃饭，“大学，你娃毕业以后出去开馆子，肯定能做大，到时候不要忘了把兄弟们带上哦。”老果果说。

“你把我们眼睛耳朵都洗了，”刘灶头说。“今天这些菜，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第一次吃哦。”

我一再很低调，“回锅肉之所以都这样炒，我看那凉粉都放了几天了，带凉皮切厚些，合炒一下，那肉味肯定杀进去，凉粉比肉还好吃。”

“嗯嗯，确实。”大家一看，盆子里的凉粉一个没剩，肉倒有很多。

继续装假老练吧。我知道为了打死不去号子送饭，都是临时把家里邻居和街对面苍蝇馆子里吃到的看到的翻新一下，瞎胡来，那汤也是，伙房门口那盆免费汤，平时都是炒完各种菜的洗锅水，端出去的时候，加瓢油，撒一把葱花，美其名曰：合汤。我只是把送进号子里的老南瓜舀两碗放在汤里，案板上有一大碗鸭血都快发霉了，切成丁，滚水氽一下，都放进汤盆里，比洗锅水好，日麻笛将就喝吧。

中午在伙房忙完，想起早上那心跳的一幕，松了一大口气。我被带回号房歇息。

爬到自己的铺位上正要躺下。就见博士端了茶过来，“大学，喝口茶。”我端着搪瓷碗坐在炕沿上，茶博士就在我身后蹲下，开始轻轻揉捏着我的两个肩膀。这个小学老师，语文、算术、美术、音乐全教，为了一点工资，把教育局的一个科长打了，拘留十五天。

一伙人还没有午睡，昨天进来的老板凳还蹶着屁股推着一毛巾来来回回地擦着过道的水泥地面，抹桌布坐在一边监督。

我正奇怪，吃完午饭都快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在做清洗，号子里的气氛有点怪异。

老板凳直起身来，把抹布一扔，说“这下干净了吧。”

薛跛子斜躺在铺上，朝菜包子努努嘴，使个眼色，“去检查一下。”

菜包子跳下炕，低着头，在擦得照得见人影的地上一寸一寸地寻找，就像勘探地面下的金子。“嘿，这儿还有！”菜包子似有重大发现，从地面和炕壁角上拈起两颗饭粒。

老板凳一看，一脸绝望：“不可能啊，我认真抹过好几遍了，肯定没有啊！”

“没做好清洁，违规，罚打十个酸麻筋。”薛跛子坐起来兴奋地说。

“凭啥子嘛！削脑壳，硬是要整老子就明说。”老板凳红着眼、脖子上涨起三股筋。“老板凳，你真不懂事，没让你去当‘桶子’守着鱼缸，算给你面子了，你今天这顿肯定要挨。”跛子咬着牙恶狠狠说。

缩在一旁的“桶子”突然跳起来，脖子一硬，“这几颗饭明明就菜包子扔的。规矩？锤子规矩！老板凳按规矩应该接我的班，凭啥子让他升一级。”

“你狗子烂贼要造反，打翻天印！”菜包子好像就等这一句，跳起来飞起一脚，踢在“马桶”的脸上，走道里的老板凳抄起开水桶上的茶碗朝“菜包子”扔过去。旁边的小胖子、抹桌布就等老板凳这家伙动手，两个人一下就将他扑倒在地，号房里一瞬间就炸开了，炕上炕下、从马桶到开水桶，到处拳脚交加，哭声、骂声喊叫震得耳朵嗡嗡响，这声音在对面的文科宿听起来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每周都有一次，只是对面不能看见号门里面嘶声哀号的黑暗中心罢了。

“报告干事，报告干事，有人打架！”薛跛子冲到门口，用手使劲拍打门板，对着饭口大声喊叫起来。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号房的门“哐当”打开，小巨干事提着电警棍，和两个红毛冲了进来，冲着几个头破血流的人说，“滚出来！”号子里除了我和跛子，全都被赶了出去。

“每个人要挨插十下电警棍，插光脑袋啊。”薛跛子幸灾乐祸，好像早已安排好结局。

号门开了，果然进来的人都摸揉着烧得发红的头皮。老板凳最后一个进门，反背着胳膊，手上戴了一只熟铁打的土手铐。

下午三点半，我还没睡醒，又来到伙房。

“你过得，真是在上班啊。”老果果端着搪瓷缸喝茶。

晚上除号子里的饭菜，局里就几个人的饭，多做些留下给晚上值夜班的人。

老果果说伙房的采购认识飞妹的爸爸，南充的一朵花嘛，谁不知道。我找张纸匆匆写了几个字，“我很好，放心。常常梦见你。”我让老果果下午托人给我带出去给飞妹，让她帮忙交给玉子娃，我想胡玉看信后自然会交给莎姐姐。为了安全，没有信封，因为出门都要搜身。

下午所长来了，“怎样？说你娃厨艺还可以嘛。”临走郑重告诫，“吃完饭就赶快回号子点名哈。”

在伙房吃了晚饭，回到号子里等点名。就见一伙人兴高采烈，像打了大胜仗。老板凳背个手铐、垂头丧气坐在靠马桶的炕沿上，在号子里，被罚三天背铐子，算是重大违规，吃饭撒尿、擦屁股全得靠“马桶”帮他。“马桶”鼻青脸肿也被揍成了熊猫。

薛跛子正在数落老板凳，见我回来了，一蹶一蹶过来拍着我的肩膀，指着老板凳，“你娃还有啥子不服，看看别人大学，就在对面的高楼上读书，能文能武，为了女朋友敢把人的手砍了。真本事啊！来了两天就混到伙房了。你日妈笛学着点！你来来回回就只是牢房，别人来来回回是图书馆、教室、女生院。”

晚上刚点完名，向所长就把我提出来。到了值班室，他嘿嘿一笑。

“今早上那张字条，违规哈，以后不准带回号房。看你没什么恶习，就不追究了。就几天了，在外面好好干。”

“你不是说会画一些山水花鸟么，我给你找来一点东西，你看行不行？”

一张写字桌上有一叠卷起来的宣纸，一个鞋盒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颜料管

子，桌子上几只秃了毛的毛笔。一小瓶墨汁。鞋盒子里都是些广告颜料，还好，有七八只水粉的，但大多干了。

他从伙房找来两个盘子，一只碗，拿几张报纸铺垫，打开宣纸。下笔前，问他：“想要画个什么。”“随便，随便，我就看看。”

我几乎是闭着眼睛画了张《荔枝图序》，就一个破筐子里装一堆熟得快烂掉的荔枝。又用水墨画了张“松瀑图”。手生得不行，抓起揉成一团，扔了。所长出去巡视了一转，回来见地上的几团纸，赶快捡起，在桌子上展开抹着皱褶，“别扔，别扔，挂在我家最合适。我家墙上就缺这个。”

“这样吧，我给你画幅我最拿手的山水吧。标准四尺。”向所眼睛一亮，“好好”。

“今晚肯定画不完。”

“不着急，明天晚接着画。嘿，老子晓得你娃鬼头鬼脑的。你勾子一翘，就知道你要拉屎。”向所一脸鬼笑。“你安心画吧”。关上门出去了。

把一个整张的四尺宣纸对折裁开。我在初中时就临摹《溪山松居图》，至少画过三遍。只是这几支笔实在太差了，都是写大字报的，将就吧。向所进来了，提了个塑料袋，打开是伙食团的一点卤豆腐干和椒盐花生。一张裹着的报纸打开，是两瓶汽酒。

七

每周三上午是写信的时间。号子门角小窗“哐”开了，“大学，拿到，开饭前拿出来哈。”我接过五支圆珠笔、几个封信，一叠信笺纸。

号子里的人一半不会写信，都我和博士和代写，无一例外都是向家里要钱。

几乎每天中午过后，对面六楼的中文系的窗子上，都有一面镜子，把太阳光从号门上面的铁栅窗孔里反射进来。好像是敖哥的寝室，晚上偶有小提琴声飘，那肯定是敖哥在拉，在为我拉。

“你昨天说爆炒鹅卵石？”老果果问。

“今天中午开什么伙嘛？”

“没什么，老三样，就买了点小河虾。”我一看一个塑料盆子里有小半盆活蹦乱跳的小河虾，都是塘里养的，还嫩着呢！

“可以啊，有石头吗？”

“这石头真能炒啊？”伙房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嘿嘿，我试一下。”局里大门边上有个修房子的小工地，刘灶头托厨房采购骑了个自行车，很快去捡了一盆拇指头大的鹅卵石回来。

把鹅卵石淘洗干净，倒进洗菜用的长木把的铁网舀子在火上烤干。在锅里放油，姜葱蒜、干辣椒煸香，再放入鹅卵石爆炒。

一伙人目瞪口呆，以为我疯了。等到调料油浸入石头中，一颗颗枣子大的鹅卵石油光光的，吐着辛辣的香气。

我让刘灶头炒一碗干胡豆，打个鱼香味的调合，把这些小河虾淘干净，装在一只大碗里，用一盘子盖上，那虾子在里面“呼呼”跳着撞碰盘子。

找来两个砂锅，把两个小灶的煤火捅开，等炉火上来了，把两个炒锅分别放在灶眼上使劲烧，向所、小巨和几个爱看热闹的人都来了。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像是在看我表演魔术。

那只淘洗菜用的铁网舀子放在火焰熊熊的灶眼上，我把浸好油的鹅卵石往上一倒。

“哗”一大碗滴着油的石头燃了起来，喷吐着桔黄的火舌。

我双手握住舀子，把网里的石头在灶火上下颠滚，这样子倒像拿了个网耙，不是在河水边捞鱼，而是在一团火焰里捞石头。

铁网舀子烧红了。那油石头也烧得滚烫。分别倒进两个烧烫的砂锅里，我把刚炒起来的胡豆倒在石头上，把一碗鱼香调合倒进去，“哗啦”一声，砂锅里激起了一道白烟，赶快用只盘子盖上。那碗小河虾也全倾在砂锅里的滚烫的石头上，蹦起来的小河虾把盖住的盘子碰撞得当当响。用湿布包起砂锅，端起来上下翻转两下，鹅卵石“哗啦啦”直响。

一伙房的人看得心惊肉跳，向后躲闪开。

揭开盘子，一锅激好了的胡豆吐着鱼香。

揭开另一个盘子，一股热腾腾香气冲起来，油黑黑的石头间，一只只的小河虾泛着婴儿红般粉嫩的光彩。

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吞着口水，赶紧把一双筷子递给了向所。小心翼翼拈起一只虾子，飞快扔进口中。

我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了

今日午餐：

爆炒鹅卵石激鱼香胡豆 1角

爆炒鹅卵石激麻辣小河虾 2角5分

中午过后，一进号门，我就朝薛跛子招手，得意洋洋地把一支重庆牌香烟举在跟前。

全号子的人眼睛顿时放光，像一群饿狗看到了一泡屎。

“先说好，这是违规的哦，到时被抓着了打满堂红，没得老子哈。”我说，“没火啊”。

跛子一把抢过烟去，“火嘛，好说。”

一伙人悄悄忙开了。就见茶博士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根扫帚上的高粱穗子，小心翼翼把皮剥了，露出一根灯草般的芯。又从炕铺的席子下面抽出一张烟盒的锡纸，撕一小块，把那根草芯放在中间。从水泥格子上拿来一块干肥皂，把表面的硬碱刮成干粉子撒在草芯上，自言自语，“要是高锰酸钾就好了。”

锡箔纸裹住草芯和肥皂粉，成了筷子粗细的一截药芯，外面再用擦屁股用的土草纸紧紧裹成小手指粗细的捻子。

“博士，你看火，菜包子，放牛娃，抹布轮流来。”

揭开炕席，木头板子露了出来。菜包子从门口找了只平底塑料布鞋，把手套在鞋里，用鞋底把那根火捻子死死压在了床板上。

菜包子深吸一口气，突然右臂发力，用鞋底把捻子一阵猛搓。

二十多下后，放牛娃赶快接过鞋子，使出吃奶的劲继续猛搓。

“抹桌布，上！”

那捻子被压在床板上上来来回回飞快地搓动，几轮下来，开始有了气息，然后飘出焦糊味，最后冒出了缕缕青烟。

茶博士皱着眉头，眼睛死死盯着鞋底下面，鼻子一呼一吸在使劲闻。

轮了八九圈，那青烟和焦糊味越来越浓，博士大喊一声“停”，飞快抓起火

捻子两手一掰。

“啪”捻子断成两截，博士拿到嘴边，“呼呼呼”几吹，那捻子的两个断头里，火星在隐隐闪耀。

中午的“爆炒鹅卵石”，立即就传出风声去了。我刚回号子里躺下，门开了，小巨急促促把我叫出来。“不让人中午睡觉哦！”

“有点急事，问你！”

值班室，向所、老果果、刘灶头正神情紧张地等我，像有严重的事情发生。就像谁在锅里下了毒，我一下紧张起来。

“大学，这样的，”所长说，“省里正在搞个什么职工食堂比赛，省二监也参加了今天的初赛，你有主意吗，我们都一个系统，他们这两天都在准备，你主意多，参考一下。”

老果果说：“今天三点钟就开始初赛，鸡鸭鱼肉不限。”

“都几点钟了，还来得及吗？有多少单位参加啊？”

“听说有二十几个吧，分成四组，每组只有第一名取胜。”

“比什么啊？”

比赛规则好像是菜的成本在1.2元之内，成本谁低谁胜。这价格有专门的单位测算，至少三样，主菜、汤、主食。再就是色、香、味，看谁好吃呗。”

几个人都在争论，老果果看着我，“大学，你娃主意多，说说嘛。”

“我可能乱说哦！行不行哦！”

“这个麻烦，又要花钱少，还要有主菜、汤、主食，又要好吃，”刘灶头说。“职工食堂比赛嘛，肯定要家常菜，这好像是全国工会组织第一次哦。”

一帮人待在值班室，等比赛会场那边打电话过来。

看我没吱声，小巨叫刘灶去伙食泡杯茶过来，又递给我一支烟。

“大学，你好好想想，赢了对我们很重要。”“听说谁赢了半决赛，除了奖状，还有200元的奖金。如果得了冠军，市政府答应免费到成都参观火车。”

我知道向所从前就是省二监的干事，老果果和两个灶头都是从省二监伙食团调过来的。这个比赛对他们还很重要，都想上成都省城看火车啊。

三点正，电话响了，向所接到。“我们抽到肉。”我在旁边急问，“什么肉？”向所把话筒给我。

电话另一头伊哩哇哇，气喘吁吁听不清楚，肯定是跑过来打电话的。“你们原来打算做什么菜？”

“想弄个粉蒸排骨，冬瓜排骨汤，南瓜蒸饭。”

我在旁边听着，摇着头。“嗯，可以，就是成本有点高。”

“这样吧，做豆汤饭。”

“啥子呢，对方没听清楚。”

“豆——汤——饭”，我把怎样做详细交代了。放下电话。

“这是什么啊？”“没吃过。”值班室里的人七嘴八舌。

“在成都我家对面，有一个小馆子天天卖的东西，行不行我也不知道。还是去做他们的粉蒸肉保险，我去睡一会吧。”

我就在伙房老果果的破椅子上，扶着案板睡着了，还真梦见了在家里街对面吃一碗香喷喷的豆汤饭，上面还撒了几颗绿嫩嫩的葱花呢。等我醒来，清口水把袖子都打湿了。

“别人比赛标准有主菜、汤、主食三样，你主菜是啥子啊？”

“哈哈，肥肠节子炖豌豆啊。”“那汤呢？”“肥肠豌豆汤，豆汤啊，宝气。”“主食呢？”“嘿嘿，用豆汤泡饭，豆汤饭啊！很好吃的东西，我家拐弯靠东大街的口子上和青石桥边上，至少有两家挂着蓝底白字“豆汤饭”的酒旗子。这还不够主菜和主食啊，每家都是：一碗肥肠节子豆汤，一碗饭，一碟泡菜，一共才五毛钱，泡菜不仅免费，还可以再加。”

老果果捶胸顿足，“要是他们听大学的就好了，光这成本就赢了一分。刘灶，明天就叫采购去搞笼肠子，马上把豌豆泡起，明天中午就开豆汤饭，免得馋得大家流口水。”

五点半，刚要开始开饭，小巨跑来了，“赢了，赢了，就是大学的豆汤饭。”

“谁知道明天又比什么？”

我的心在门外，耳朵听着值班室的声音，想着还没完成的那幅山水，想着那瓶酒。

又开始下雨，春雨丝丝。天全黑了。

我听见有人从屋檐下走过来，到号房门前停住，号房门的饭口打开了，一个人站在外面，我没看清，没人说话，我以为是大毛子老张干事或小巨干事，就听有人在轻声叫我的名字。我走近门口一看，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外面站着一个女神，是蓝袜子。

我一时手足无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钉在那里。

老张朝号子里大声喊，“都转过身，靠墙。”号子里的人都很懂事，立即转身，全部背朝号门。

她什么也没说，就看着我，手伸进来。我赶紧抓住她的手，死死不放。

号房门开了，我去开始继续那张“山居图”。今晚桌上的塑料袋里，一大包老街上的“红白灯笼”的卤菜，还有两瓶新开的汽酒。

隐隐约约听见楼上刘亚明的音乐响了，是那首迪斯科《我的心上人》。我的心上人，请你不要走，音乐正悠扬，鼓声伴着好节奏。

八

回到号房，我一招手，跛跛立即就觉得有的东西，飞快地闪过来。我从兜里摸出一根烟，“重庆牌！莫给老子弄得打满堂红哈。”号子里最怕有火，只要发现号房里有人抽烟，无论抽没抽，所有人都一律被罚——靠墙蹲成一排，干事用电警棍在每人的光脑袋上一律擂一圈。搓火者或藏烟者擂三圈。三圈下来，没有哪个脑袋的头皮不被脱一层。

“没事，白天用电打火。”跛子说，“白天打火，闪了灯泡或打断了保险，不容易被发现。”

博士把一根筷子头剖开，做成一个小叉子，再撕下一条锡管的牙膏皮连在两个叉头上，把被子撕开一个角，扯下棉絮，小心翼翼把绵绒裹在插头上。一只电子点火器就做好了。“人梯。”跛子就下命令。

就见小胖子和菜包子靠墙蹲下，博士两脚踩在两个人的肩上，一手扶墙，一手拿着点火器，就听“一、二、三，起！”放牛娃和菜包子双手扶墙，猛地立起身子，把茶博士托在了半空中。

茶博士熟练地把灯泡拧下来，把点火的筷子叉头对准灯座一插。

“嘭”灯座闪出一团蓝色的火光。博士把叉头拿到嘴边，轻轻一吹，那绵绒立即闪起了火星。

“有啦！”博士把灯泡重新拧上，从两人的肩上跳下来。那筷子头上的绵绒正冒出一缕青烟。

回到伙房，电话又来了。

半决赛就剩四个单位，西南石油地调处、红白灯笼、师范学院、省二监。抽签结果：省二监和地调处一组，红白灯笼和师院一组。

食材仍是鸡、鸭、鱼、肉随选。

比赛条件有所改变，地调处有一半人是北方人，厨师会做牛羊菜。所有人都看着我。我笑嘻嘻地说：“我们今晚也要吃这锅。他们用羊，我们用牛，牛杂锅。”

在成都老家，物资局的宿舍院子，隔壁邻居有一家姓黄，以前是四川阿坝州骑兵连转业回来，他是山东人，特别喜欢做面食，但常常吃牛杂，做法很家常很简单。

我把这黄氏牛杂锅的制作过程一说完，一屋里的人都在流口水。

电话打过去了，那边的人一一记下来。

下午要开饭的时候，电话来了。

向所、小巨，把我从伙房叫到值班室，值班室挤了很多人，个个喜笑颜开，周局也在里面，我知道省二监赢了。这单位马上就要去成都参观火车了。

那红白灯笼用一口鸡杂锅，就把师院队的一桌蒸菜系列丢翻了。

这边组的石油地调处做了一桌乱七八糟的羊肉宴，当省二监的黄氏牛杂锅一端上桌，八个拼盘一摆，打开锅盖，全场人的鼻子都变成了狗鼻子，闻到了香气的那一刻，牛杂锅就赢了。

明天和红白灯笼对决。

我说和我没关系了，我七天的牢期已满，明天就出狱。

“你们看着办吧，而且明天是上午抽签决赛，还在我们学院的学生食堂里。我肯定不去。”所有人都面面相觑。

周局过来，把我叫到一边，眼睛朝上，“大学，你搞清楚，我没记错的话，要到明天晚上才满期，才能放。但我们已研究决定了，鉴于你在关押期间表现好，提前半天释放，中午过后你就走人。”向所长把释放通知书都开好了，给你拿着，明上午要好好努力，把你学到的知识本领使出来。”

“我又不是学做饭的厨师。乱劈柴啊！”

所长过来，“哎，大学，不要这样说，你看这两回，只要是你出的点子，结果都赢了。明天上午虽然你还是号子里的人，还我管，但我们很有缘分嘛，你明天出去了，咱还是朋友。”

“我总不能戴着手铐秃着头在老师同学面前给大家表演做菜吧，连我女朋友都不理我了。”

“嘿嘿，我们想办法，想办法。”

老果果过来说“晚上我们给你饯行，就做今天这道牛杂锅。”

“晚上十点半给我端到号子里来，行不行？”我凑着老果果的耳朵悄悄说。

“啊？”老果果张大嘴。

不行就算球啰，反正先老子明天就出去了。

晚上十点半，号子的门开了，红毛老张和老果果端了一大铁锅过来，这锅刚从灶上下来，还咕嘟咕嘟地滚着呢。

那红毛对着号子大声喊：“转身”，号子里所有人都立即转身躺着，背对着号门。

老果果把一个搪瓷碗递到我手里，掏出一瓶绿豆烧倒在碗里，“快些，一个小时后我来收东西。”

我朝薛跛子他们招招手，“都来吃点吧。”

二楼刘亚明的音乐又响了，春来无痕迹，春去无消息。寄语多情人，勿为多情系。我喝了一口酒，一点也不想动筷子。

九

早饭点名过后，红毛担着开水桶来了，每个号房都打进一塑料桶滚热的水。

茶博士把那只白色的搪瓷碗洗净，用开水烫一下，掰一块重庆沱茶，勺进小半碗水后，再放在开水桶里，那搪瓷碗浮在一桶有盖子的滚水里，足以把那邦硬的茶块发开了。

博士揭开塑料桶盖子，把茶碗拿出来，一碗红红的早茶便开始喝了——只有跛子、菜包子和茶博士才有资格可以喝。其他的只能灌白开水。

跛子端着茶碗递到我跟前，说声“大学，后会有期。”

这顿锅灶比赛，本来在学院的灯光球场举行。但半夜下起了雨，到早上还没有停歇。决赛只得临时搬到女生宿舍对面的第三食堂进行。

三食堂是学院三个学生食堂中最大最新的，里面用长条椅子隔出一半。墙上拉了横幅“四川省职工食堂厨艺大赛南充片区（决赛）”。横幅下面，左右各两张大的乒乓球桌上摆了四个煤气灶，两边排开，两只大的液化气罐靠在墙角上，两队人马，白帽白衣，排好队各自站在自己的四个灶台前等待抽签。

离灶台两步，两张大圆桌铺了白布，准备上菜用。圆桌后面是一排课桌和十把靠椅，供评委们使用。后面是几排会议用的长条椅子。

一大早我就被叫起来了，到伙房里把胡子刮得光光的。戴了一个厨师帽和白制服。小巨来了，找来一个深茶色宽边平光眼镜给我戴上。

“龟儿子哪个都认不出来。”我在值班室的镜子里照见自己，摘下眼镜，镜中的那人苍白，消瘦，秃头，光着下巴，一个陌生人，就在昏暗的房间深处呆呆地看着我。

更陌生的是这个学校，来来回回的裤子上有个大屁股补丁的女同学，熙熙攘攘戴眼镜提个暖水瓶夹个饭盒的男同学，灰溜溜的宿舍，雾气中的教室……不足七天，仿佛一下就相隔了七年。我一点都不认识了，习惯了还要回到那脏兮兮的号子里，好像天生就在那里。我埋着头，像个俘虏，和一队伙房里的人走进了学校。

上午九点，决赛的抽签开始。决赛只有两种食材，猪和牛。决赛标准和半决赛一样。

1. 好吃；2. 创新；3. 一桌八人，每人低于 1.2 元；4. 八菜、主食、汤、小菜；5. 造型。

一个主持人，拿个硬币，省二监和红白灯笼的厨长分别要了正面和负面，主持人朝空中抛币，红白灯笼选猪。省二监只得选牛。

硬币还没抛，我一看那红白灯笼的厨长，倒抽一口凉气，那戴白帽子的老头就是那天被砍断手的父亲啊！我埋头转身悄悄躲到小巨的后面。

两队开始商量报菜名。这边一伙罗罗嗦嗦，莫衷一是。

红白灯笼很快出招了：猪头宴。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毕竟做了几十年的烧腊卤菜行当了。

我看见一帮人围在那里争执不下，老果果过来把我从旁边打杂的位子上拉过去。“怎么办？他们昨天就把牛杂都差不多做光了，今天只有做牛肉了。”

“日麻笛，他做头，老子就做尾，做牛尾锅吧。”

猪头宴对牛尾锅，十二点正开锅评比，中间只有三小时，两队人立马像听到了冲锋号，冲到食堂的伙房里忙开了。

还好，就是昨天那头黄牛，牛杂、牛肉和牛骨分别放在几个筐子里。一条近一米长的牛尾连着屁股下面的一大坨，和一大堆牛骨放在一起。

老果果抱怨：“时间太紧了。一根牛尾，不成席啊，对方的猪头宴，耳朵、拱嘴、舌、天堂、脖、眼睛、槽头肉、核桃肉就可拼八大盘。”

“有几个评委？”我问。“八个，刚好一桌。”

“妈的，一条牛尾最多只能切六段，尾头和尾尖都不能用。”我心里在盘算。“等会上桌，就只上六碗，另外两只放空碗。”“八个评委啊，另外两个咋办？”老果果愁死了。

“咋办？拿两个评委凉拌，让他们自己去谦让，官小的肯定给官大的先尝，领导这样般光荣地吃了，还能说差吗？”我在一边笑起来。

“对了，他们那八盘全是肉的，咱八盘全用素的涮锅，魔芋、豆腐、蘑菇、筒蒿、青笋、卷心白、青菜脑壳，管球它的呢，死马当活马医吧。”

泡姜和泡辣椒，真丢人，整个学院三个食堂找遍了都没泡辣椒，只有些泡姜。

“到五凤山上找一些柠檬叶来，没有的话，广柑叶也可以。”我叮嘱。我一直都在笑。“大学，有啥子可笑的。今天我们可能输球了，这鸡巴牛尾！”

“嗯，就做这牛鸡巴。那条牛尾下面不是还有一条牛鞭吗，把这牛鸡巴拿来清炖了，用茨菇炖，就叫做茨菇金线肉，用作餐后清汤，悄悄的，千万不要说。”

老果果捂着嘴猛笑，“这东西壮阳啊，吃了鸡巴邦硬，要搭帐篷哦，恐怕没法走路。”

“没事，今天是周末，日麻笛，评委们今天可以早点上床睡觉嘛！”

这边四个炉灶，一个用小火在吊牛骨汤，一只铁锅盖着木锅盖，那根牛鞭连着两颗鸡蛋盘成一圈钉在木盖子里面，锅里煮着茨菇，用锅里的蒸汽把牛鞭蒸烂乎，牛鞭的汤汁一滴不漏全在茨菇汤里。铺着白布的大圆桌的中间，一只煤气炉，围着一只镔铁皮的锅圈，一个稍大的铁锅扣住木锅盖，用小火在炖牛尾。八个白圆盘子，八个青青白白的素菜蔬围着牛尾锅。

这边一帮人做牛的人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喝茶、闲聊、无事可做。

那边一伙做猪的忙忙碌碌，像一群人在聚众打斗。

十二点正。两桌全部摆齐。

菜名开始报出来，红白灯笼那边，祥瑞猪头宴。这边柠檬泡椒牛尾锅。

我揉着眼睛差点睡着了，在人群中悄悄退出来。

我太累了，好不容易爬上宿舍的六楼，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我，离我很远。

我浑身发臭，像个怪物，一个秃白沙脑袋。只有偶尔有人朝我打个招呼，就飞快闪掉。

回到 626 寝室，只有长安和黄疯子在，好像不认识了，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不敢和我打招呼。我把全身脱得赤条条的，在鸡巴毛里仔细翻了翻。“嗯，还好，没尖脑壳。”

长安过来，把衣裤全塞在一个塑料桶里，“下午打开水，放一袋洗衣粉，泡两天再说。”我给他交代。

“那个扔在地上的军大衣，你们在衬里找找，如果找到两个虱子，就叫我一声。”

爬到床上，自言自语，像和空气在说话，“好不容易才把你们喂肥，真对不住，老大，老白，该吃你们了。”说完一笑，扑头睡死过去。

重影

——扬州杂忆

汪晖

汪晖，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1976年自扬州市鲁迅中学毕业后，曾先后在罐头厂、纺织厂和无线电厂担任临时工、徒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1981级硕士研究生，1984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唐弢教授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及鲁迅研究工作。1988-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2002年调入清华大学，曾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京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柏林高等研究院等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担任高等研究员、访问教授。1991年与友人创办《学人》丛刊，1996-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著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去政治化的政治》、《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等著作，大量作品被翻译为英文、德文、日文、韩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2008年被美国《外交事务》和英国《展望》周刊评选为全球百名知识分子之一，2009年德国《时代》周报将他作为全球十二位“为未来思考的思想家”之一给予评介。

片鳞：1976

1976年1月8日的早晨，像往常一样，我挎着书包向护城河南侧的鲁迅中学走去。水面波光粼粼，岸边如平日一样安宁。新北门桥坐落在护城河的西北边，东边是乾隆登岸的冶春御码头，西边拐弯就是瘦西湖。同学柏鹏匆匆走过来。他面色凝重，不像16岁的少年。临到跟前，他劈头就是一句：周总理逝世了。我的心突然下沉。我们一路往学校走，到了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了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那些日子并没有停课，但标语在黑板上停留了约一周，上课的老师谁也不愿将字迹擦掉。他们在那行大字前讲课的身影偶尔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我的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学期，很快就是寒假了。但可能是正处于敏感的时期，免得我们毕业后惹是生非，开春之后，我们这一届又延长了一个学期。我总计在中学呆了四年半，加上小学的五年半，从1966至1976年，正好覆盖“文革”十年。1976年，与周总理遗言相关的各种手抄本及“反动谣言”四处飘散。语文老师夏耘曾花力气研究和整理扬州评话，在课堂上，他用一种评话式的幽默调侃当时的政治，但清查谣言时，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说过在同一个讲台上说过的话。我们目瞪口呆，但心照不宣。追查谣言的事不了了之，学校干脆让同学们外出拉练，住到农场去劳动，省得在毕业前夕出事。拉练的路

途从扬州到邵伯再到高邮，跑得我们满脚水泡，然后转回扬州。途中，班主任刘颖老师走在队伍后面，她那时也就是三十出头吧，还梳着辫子，悄悄地向柏鹏讲述她的看法，柏鹏又转告我。师生间共享某种犯忌的秘密，是一种奇特的政治经验。拉练之后，我们就到扬州农科所的农场劳动，“四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同屋的十余个男生一起剃了光头，在不允许游行的告诫下，排成一行，先在宿舍内而后围绕宿舍外侧，鱼贯而行。没有呼喊，但有歌唱，光着头歌唱。那可是在电影《红高粱》上映的十多年之前。我们都在16岁上下，叛逆的年龄，对于政治并不真懂，但一种政治的氛围以特殊的方式冲击着敏感的神经。

到五、六月，学校提前放假，我们毕业了。那时上山下乡尚未结束，有些同学下乡去了。我未满17岁，未达法定的工作年龄，既不能下乡，也不能分配工作。7月间唐山地震，全国都受了惊吓。附近的溧阳晃了几下，倒了几间房，这一带据说也在遍布全国的四条地震带的其中一条上。那时最出名的人物就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了。柏鹏先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地震观测室打工，天天盯着仪表，我偶尔去看他，很是羡慕。我和几个院子里一起长大的朋友每天拿着老虎钳，走家串户，帮人搭建防震棚。从1976年夏季到1977年春天，我们在防震棚里住了近一年。防震棚的两侧先是用葵花杆编制，后来有了芦席，上面则先是塑料布，后来变成了油毡。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我的曾祖母大概是在棚子里受了寒，第二年就去世了。

就在闹地震的时候，我开始了打工生涯。临时工不需要签任何合同，只要得到工厂的许诺，就去上班，按天或按月拿钱，没活时就走人。我的第一份临时工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按天拿工资，一天一元钱。每天早晨，我用铁皮车从冷库里将已经切开的猪肉按肥肉和瘦肉两种，推到车间，然后用戴了纱布手套的手将冻肉自铁皮车中装入脸盆，提至半空，倒入绞肉机。这是第一道工序，接下来是肥瘦合并搅拌，加入调料等，最终装罐、加热。挖了几脸盆肉之后，必须将冰冻的双手浸在热水中恢复知觉。休息的时候，我们围在巨大的榨油机旁边，等待出油后，拿几块油渣放入嘴里，那可真香。工作中偶尔不慎，有人将手套或毛巾一并放入了绞肉机，又凑巧被检验科抽检出来，这一批罐头就报废了。报废的罐头廉价卖给我们。那时猪肉和油配给，每月每人半斤肉，能得到一、两罐额外的廉价罐头，父母总是很高兴。买罐头时，工厂要求将罐头瓶退还，我只能将肉和汤汁倒入饭盒，放在雪地里冷冻，凝固后再怀揣回家。

制罐厂在运河的东侧，距离我家较远。离那儿不远，是南宋末年为纪念南宋咸淳年间（1266-1274）来扬州传教的穆斯林圣人普哈丁而建的墓园和清真寺。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支系第16世裔孙，德祐元年（1275）7月20日由天津南下时病逝于运河舟中。该墓系遵其嘱而葬于扬州城东古运河畔高岗。寺院、墓域两分，其中墓域葬有普哈丁、法纳两个墓亭及明清时代的穆斯林坟墓。临河的正门门额刻石为“西域先贤普哈丁之墓”，下署“乾隆丙辰重建”。清末重修墓园，回族将军左宝贵等就埋在园内。园内墓碑上刻有铭文：“宋德祐元年西域至圣一十六世后裔大先贤补哈丁；宋景炎三年西域先贤撒敢达，明成化元年西域大贤马哈谟德，明成化五年西域先贤展马陆丁，明弘治十一年先贤法纳。”墓园坐东朝西，墓亭为阿拉伯制式，但通往正门的石桥上却像扬州园林一样刻有狮、猴等动物，显见其入乡随俗。那时家中只有一辆自行车，每次我从运河西侧登车穿过解放桥，都可以在运河的波光中，看见普哈丁墓园中郁郁葱葱的树木的倒影。早晨8点上班，因赶工加班，每天晚上10点下班。我至今还记得雪夜归家的景象，沿护城河向前伸展的，是盐阜路，两侧的树冠上

坠满雪花，在积雪上行走的车轮时时打滑，南方的雪落在年轻的脸上，旋即化开，沿着脸颊滴落。这是我第一份挣钱的工作。

几个月后，那批活赶完了，我失去了工作，遂转入离家很近的扬州毛纺厂打工。纺织厂的工作是24小时三班倒，每周轮换一次。就在工厂大门内的院子里，经人引荐，我见到了厂办夏主任。他一边听我的自我介绍，一边上下打量我，之后就吩咐我去电工房跟着小张师傅做事。两周之后，厂里在挡车车间开大会，天气炎热，工人们要求将车间里用于喷洒水雾、沉降棉絮的巨型风扇打开。我去接线，将两个很粗的铜线插入接线板，却不料铜线内层的橡胶已经腐烂，只剩外侧的蛇皮层了，那是不绝缘的。我将线头插入接线板的瞬间，耳边响起了惊雷，天崩地裂，但幸运的是我遭电击时手被弹开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我呆若木鸡，愣愣地站在那个高台上，风扇轰鸣起来，将细细的水雾喷向六、七十米的空间。正在讲话的厂长怒不可遏地喝令关掉，但我像木头一般毫无反应。

大难不死的次日，我被调离了电工房，到了挡车车间，在一百位挡车女工中间，担任唯一的打包工。一百位挡车工中，有不少是郊区农民工，她们文化不高，有些根本不识字，但心灵手巧；另有一些则是中学毕业后分配来的。挡车车间轰鸣不息，我大约在一周之后渐渐适应，夜班时竟会在沙包上睡着了。惊醒时，台子上纺完的线团已经高高堆起，等待打包，让我顿起绝望的感觉。那时常常夜间停电，只见车间内外手电的光柱四处乱跳。我在电工房时的师傅小张正在追求我们车间的小谢师傅，停电时，他总是叫上我，邀请小谢师傅到扬州市中心的唯一一家24小时开的面店吃面。小谢师傅高中毕业，在鲁迅中学高我两班，戴副黄色的圆边眼睛，显得很文气，但性格却很直爽。有时天亮了电还没有来，她就拿出羽毛球拍，带着我在厂门外的马路上打羽毛球。小张师傅人好，热心，诚恳，典型的工人模样。在那些停电的夜晚，我常在他们旁边当灯泡，吃完了面，就回我的纱堆上睡觉去了。他们最后还是没成。小谢师傅（我们那时叫她老谢）嫁给了另一个姓张的同事，他高中毕业，会画画，我们厂的毛主席像也是他画的。

1977年秋季，我和柏鹏等几个童年的朋友一道被分配到无线电元件一厂。临时工不算正式工作，没有劳动合同，我的档案表上填写的工作日期就从进入元件一厂开始，但我在前两家工厂打工的时间长于这份只延续了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元件一厂与纺织厂一样，也是一家大集体性质的工厂。那时的工厂分国营、大集体和小集体三种，劳保待遇各不相同，但工资的差别并不很大。徒工的工资起初是13元，到我离开的时候涨到了16元。有了工资，但粮票却从学生口粮的32斤变成了成人口粮的28斤。元件一厂常常没有活干，就听师傅们聊天。我们车间的工人多是长江越剧团解散后并入工厂的女演员，车间主任姓马，就是原来越剧团的团长，唱老生的。她声音低沉又洪亮，性格很爽朗，而师傅们多半很俊俏，坐在那里家长里短，自己的丈夫或别人的丈夫，当然还有孩子，是说不完的话题。有位漂亮的女工，常在丈夫休息时同时休假，其他女工满脸鄙夷，却又明显带着羡慕和忌妒。她们相互找碴，也相互帮助，但对新来的年轻人一律很好。每天就上那几个螺钉，实在沉闷，我有时借故走开，将大礼堂的门关起来，与其他年轻人打乒乓球。在她们中间，我像一个心不在焉的、时时溜号的龙套。马主任来车间查看，就像剧团的团长在上台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又像舞台上的老生，凝视着坐在桌前的青衣与花旦们。女工们见我不在，总是打掩护地说，刚才还在这儿，或许是上厕所去了吧。有一回，我们正在礼堂里厮杀，关闭的大门忽然响起来了，一个工人闯了进来，说马团长要你们立刻回去。我们回到各自的车间，心怦怦地跳，但她见到我们时，只是会心地笑笑。工厂不只是生产机构，也是一

个单位。所谓单位大致介于街道与生产机构之间——说它像街道，是因为工厂是一个社区，人与人的交往很频密，除了读报学习，家长里短，平时常在一起聊天，人和人之间像住在一个街道上的邻居；说它是工厂，是因为它不同于纯粹的街道，承担着生产的任务，发放工资，也提供一些劳保费用。

进厂不久，国家就宣布要恢复高考了。但偏巧高考前的那三个月厂里来了活，是一批军用电话，我就在那里装配螺钉。虽然简陋，却是流水作业，偷懒不得，找不到时间复习。上大学是一个潮流，但我并没有很多的渴望，觉得当工人也很好。十年间毕业的学生全部挤在同一年考试，而恢复的学校又不那么多，父母对我能否考取心中没有数，只是表示不希望我上文科。那年的高考分初考和复试两次，初考通过后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复试公布后重新填表的那天，父母都不在家，我就在表上将理科改成了文科。那天晚上，父母为此与我争执起来，可表格已经送走，覆水难收了。他们自己从事的是文科工作，却对文科如此敌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1978年3月1日，我和其他的77级大学生一样，终于入学了。

我的学校我的家

扬州师院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在这里居住玩耍。每次回家乡探望父母，与朋友相聚，除了偶尔的例外，我都住在瘦西湖边、师院东门内的专家楼。那个地方距离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居所，大约一、两分钟的路程，距离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家不足十分钟的路程。在这方小小的空间里，居住着我从小就熟悉的前辈和父母的同事、朋友，但从1978年起，他们——连同我的母亲——突然间也成了我的老师。

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中上大学，尴尬是难免的。若是某门考试成绩不好，母亲很快就知道了。但最尴尬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母亲成了老师。每次她进入教室开始讲课，我都紧张得很，生怕她说错了什么；每逢她的课程，我都坐在最后，不能分清是在听讲，还是在看她讲课；每次课程结束，我都像是松了一口气。我至今还不能分辨为什么她讲课的时候，我会那么紧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我希望母亲是完美的。这是奇怪的母子间的感应，但我的母亲未必知道我总是为她紧张。

我的家坐落在临近护城河的师院新北门宿舍，那是一个由竹篱笆围起的红瓦灰墙的平房构成的村落，四十户人家，中间是一个幼儿园。篱笆的南侧是麦田，麦田过去是一片丘陵状的松树林，过了松树林就是通往瘦西湖的护城河；北侧有条不宽的马路，马路的另一面是刘庄的田野，形似骆驼的土丘坐落在不远处，那下面有个鱼塘。天暖和的时候，几个儿时的朋友会跳入池塘，故意将水搅混，逼得那些鲢鱼窜出水面。我家的南门正对着谭佛雏老师（1919-1997）和孙龙父老师（1917-1979）两家的北门。谭老师是湖南津市人，早年毕业于国立湖南大学中文系，身材矮小，戴老式眼睛，他给我们讲课用的讲义后来集结成为《王国维诗学研究》，至今仍是王国维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老一代学者中旧学修养好的人很多，但地处边缘，西学修养好的就不多了，谭先生的专业为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是老一代中少数通外文并对西方理论有精深理解的人。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课程，逐篇逐句详解，旁征博引，从中国的典故，到柏拉图、叔本华和尼采，我们就在知识的云雾中穿行。谭先生上课前总要喝杯酒提神，讲解时脸颊上泛着一层红光，王国维的简短的文字就在他带着湖南乡音的声调中渐渐地负载起深文大义，让我们对于何谓深入字里行间——古人所谓“读字缝”——

一的深度细读，有了亲切的体会。有一回，有位年轻的外地学者来扬州讲解《离骚》中的“五次飞行”，调动了神话学、人类学等等新知，其立论之大胆，让我们在兴奋之余将信将疑。谭先生是前辈，却总是前往听讲，有一天傍晚，我正好与谭先生同行，便请教他对前一次讲演的看法。谭先生一向以严谨著称，但他的评论却是：即便是闻一多、姜亮夫的楚辞研究，也有许多误释，这位年轻学者的演讲或许百分之八十的说法靠不住，但只要百分之二十属真正的创见，就不得了了。

扬州师院的老一代学者中的大部分人，早期学术训练源自家学、私塾等，有清晰的地方渊源。他们重视地方传统和民间传统的传承和创新，便是自然的了。孙龙父先生祖籍泰州，早年即以金石书画名世，是吴熙载之后又一扬州书法大家。他真、草、隶、篆皆工，尤擅章草，与林散之、高二适、费新我合称“江苏四老”。他的梅花千姿百态，也是一绝。孙先生为人谦和，有求必应，学问上尤其重视扬州评话，曾与孙家讯、陈达祚等合作整理出版王少堂扬州评话《武松》和《宋江》等，是至今流传的扬州评话经典。住在校内北宿舍的蒋逸雪先生(1902-1985)研究清代扬州学派，追随他学习的李坦老师后来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和校勘刘师培全集，就是沿着这一学术脉络而来的吧。早在1944年，蒋先生就在《东方杂志》发表《老残游记考证》，这一兴趣一直延续至他的晚年。1980年，他出版了《刘鹗年谱》。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的第一部年谱著作，他早年的《张溥年谱》即获史学界承认，此后还编有《陆秀夫年谱》等。他是盐城建湖人，抗战时随江苏联合中学西迁四川，任国史馆编辑主任，与金石学家王献唐结为挚友，晚年还曾整理王献唐遗稿《炎黄世族考》。他曾任玉门油矿局秘书，撰写《敦煌考古纪程》。我在1983年来北京访学时，曾去镇江南郊五峰口去探望退休在家的蒋先生，请他为我写封信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王士菁先生，以便在鲁迅博物馆查阅鲁迅藏书。他是王先生的私塾老师，还曾在王先生最困难时资助其上学。

用民间的、平民的传统抗拒正统的、贵族的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这些貌似保守的老辈人其实正是一个新传统的产物。在我往来最多的老一辈人中，除了我的硕士导师章石承先生(1911-1990)外，就算后来以元曲研究出名的徐沁君先生(1911-2001)了。他较晚搬入新北门宿舍，先住在传达室，后来搬到一栋三层楼房的第一层。他在1959年被错划为所谓“历史反革命”，1970年代后期我母亲有一次查阅档案时发现那只是某个领导人的口头宣示，从无任何组织决定。这个发现为他的平反铺平了道路，他因此很信任我母亲。我有时从家的后门出来，就见他躺在一张竹椅上看书，在温暖的阳光和婆娑的树影之间，神态安详。我常跑过去坐在小竹椅上听他聊天。他是江苏靖江人，于1930年肄业于上海私立知行学院，先后在四川和江苏各地的中学任教，在1957年调入扬州师院的前身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之前，曾任教于靖江中学、扬州中学和泰州中学等著名中学。1980年，他出版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得到王季思、隋树森等行家的极高评价。这部著作始于“文革”初期，完成于他下放师范学院农场期间，草稿是写在各种稿纸、烟壳及报纸边角上的。他的校勘和考订，以及“以曲证曲”、旁采宋元俗语方言的原则，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他承续吴梅先生的传统，兼采各种新的成果，系统整理南北曲曲律。他的弟子许建中先生将他的贡献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参考前代曲谱，大量归纳作品曲例；援引例证，考镜源流，重新校订定格，兼顾变格，说明异名、误题及词牌、诸宫调等情况；揭示首牌和次牌等组套方式、孤牌成套、构成集曲、是否与小令兼用等不同的曲牌特征；采用新式标点。这些方法不但上承古典学术传统，也是在王国维、任中敏、郑振铎

及现代整理国故运动的脉络中形成的新方法。我后来才得知，徐先生早年曾经写过新诗，在无锡和上海念书时，曾亲炙钱穆、胡云翼、刘大杰先生的教诲，也听过张君勱、张东荪、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的讲授。我听他讲起更多的是王季思、钱南扬等同行专家的名字。我们入学后，他是古典文学的授课老师之一，我所写的第一篇古典文学作业是关于曹植的《白马篇》的文章，就是交给徐先生的。他很喜欢，找我去谈，后来就从文本到人事，从人事到历史，无所不谈了。

徐先生为人低调，但私下交谈时无论对人对事，均有明确的判断。他也偶尔谈及过去，但语焉不详。我问过母亲有关徐先生在1959年被当年的领导人说成是“历史反革命”的缘由，得到的回答是他在1947年曾担任陈启天的随行秘书，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陈还为他准备了去台湾的船票，但徐先生拒绝了。陈启天（1893-1984）是湖北黄陂人，1921年考入南京高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来与余家菊、李璜等人一起倡导“国家主义教育”。1924年高师毕业后，他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主编《中华教育界》，并与曾琦一起创办《醒狮》周刊，参与组织国家教育协会，学会的宗旨是“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国家事业、国家工具、国家制度”，推动以收回教育权为号召的国家主义教育运动。陈启天曾任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常委、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69年夏天在台湾被选举为青年党主席。徐先生早年在上海知行学院学习，陈曾任该院院长，彼时又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1948年改任行政院工商部部长）。青年党是亲国民党的组织，因此，陈虽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但1945年在老政协召开前夕，已被民盟开除。徐先生很少谈论政治，完全集中心力于学术研究，但绝不是迂腐的老学究，其渊源有自，却是许多他的同事所不知的。

任中敏先生（1897-1991）原名讷，字中敏，号二北，别号半塘。他曾任四川大学教授，调入扬州师院已经是1980年了。据说他的调动是经过两位学生胡乔木、蒋南翔的运作才得以成功的。难怪1981年扬州师院上报他为硕士导师时，教育部竟批准他为首批博士导师。任先生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商人之家，1918年，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得到词曲大师吴梅先生的赏识。他是1919年5月4日因火烧曹汝霖宅而被捕的20名学生之一。1923年任教东吴大学时，他就寓居吴寓，得读各种词曲善本。除了知道他学问大之外，我隐约听说他曾担任胡汉民的秘书，但未得证实，能够确定的是他曾在抗战期间担任汉民中学的校长，该校创办于1937年抗战爆发的前夜，地处栖霞山麓，南京沦陷后迁往桂林。任先生用“艰苦抗日，灭此朝食”的口号，在学校食堂禁绝八年的早餐。

任先生性格直率、刚愎，思想锐利、不妥协，历久而弥坚，由两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件事情是大闹江苏省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地点就在教师阅览室楼下的会议室内。中国各种典籍浩繁，古籍整理是历代王朝的功业。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新式标点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标点、分段、校勘、重印、笺注、今译等成为古籍整理的主要形式。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但这项工作在中断。1981年9月，在陈云的干预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翌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由李一氓任组长，各省市也随之成立相应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机构。中华书局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务，为配合这项工作，各地又相继成立了一批古籍出版社，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岳麓书社等等。这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的大事。大约就在那前后，江苏省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在扬州师院召开，却未邀请任先生列席，他闻讯后不请自来，痛斥负

责人，遭顶撞后，朝天举着拐杖，像陀螺一般晃悠着冲出门去，那场景、那声音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

另一件事情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任先生的学术工作以词曲和敦煌学为主，他的笔名二北即北宋词与北曲的意思。从四十年代起，他由宋上追，开辟唐代声乐文艺研究，逐渐奠定其词曲研究的宗师地位。1958年出版的《唐戏弄》探究唐戏发展过程，从辨体、剧录、伎艺、脚色、演员、设备、脚本、戏台、音乐、化妆、服饰、道具各方面证明唐代已大致具备戏曲表演的基本形态，提出“我国演故事之戏剧，固早始于汉，而盛于唐”。由此上溯，他又论证周有“戏礼”，汉至隋有“戏象”，唐有“戏弄”，宋以后有“戏曲”的观点，这一沟通唐戏与宋元戏曲并溯源至周代的论述，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基本论断构成了尖锐挑战。他此后出版的《古剧衡源》、《傀儡戏探源》及采录西周以来俳优艺人优语之《优语集》，均可视为对这一脉络的进一步探索。他来扬州不久，学校举办校庆学术演讲，谭佛维先生作为中文系的代表人物设坛首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他的路数自然是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追究深文大义，声调和姿态是毕恭毕敬的。任先生听闻后要求也在同一时间设坛讲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力斥这部学术经典以西方戏剧为规律，割断源流，阉割中国戏曲的正统脉络。他声调严厉，慷慨激昂，甚至诉诸政治，批评当代学术奉清朝余孽为宗师，是十足的反动。这种尖锐的论断实际上正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价值观与“五四”时代以新精神、新方法“整理国故”的余脉，但在重申“五四”命题的八十年代反而并不受重视。有一次路过学报编辑部，正撞见他为学报发表的一篇为王国维辩护的文章而厉声斥责主编，骈四俪六，对仗工整，声调铿锵，抑扬顿挫，音色如炒豆般清脆，不愧为研究词曲和古典声乐艺术的大师。

1984年夏天，我北上京城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唐弢先生所出的考题中有关于近代红学的评论题，受惠于谭先生讲解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我得以对近代红学的脉络略知一二；而另一关于“诗余”说的题目，我的答案却是从任先生处而来。元代以后，文人称词为诗余，本有回归典雅、力避粗俗的取向，如《蜀中诗话》云：“唐人长短句，诗之余也，始于李太白。”清人戴褐夫《〈天籁集〉序》将诗余视为曲之别称：“《天籁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诗余也。诗余莫盛於元，而仁甫之作，尤称隽妙。”因此，“诗余说”兼有词曲起源及对词曲进行规范的双重意蕴。直到1980年代，北京大学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仍持此论。任先生重视“戏弄”、“声诗”、“大曲”、“杂言歌辞”（即民间和借鉴民间形式而产生的长短句歌辞）、“著辞”（酒宴中配合歌舞而与之一体的歌词）及“说唱”等等，有着“五四”以降重视民间口头传统及民俗学、民族学的印记；他深究声诗与燕乐、清乐、胡乐的关系，探明舞蹈、大曲、杂歌、杂吟在伎艺形态上对声诗的影响，无论在词曲起源论上，还是在戏剧、诗词、散曲的趣味方面，均非一般文人雅士所能比拟。他的敦煌学著作在研究脉络上也与这一思路相互支撑。除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外，学界公认《敦煌歌辞总编》为其代表性作品。在这部书中，他按照杂曲、只曲、联章、大曲等体裁对敦煌歌辞一千五百余首进行分类整理，编定年表，不但综合而且也远远超越了罗振玉、王重民、饶宗颐、戴密微等人收录和整理的规模。这些工作使他坚信词曲的来源和趣味远非“诗余说”可以概括。他曾在《文学遗产》撰文严厉批判游国恩等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所持的正统观点。当年只是庆幸读过一点任先生的著述，而今才体会出他的思想和研究与近代革命及“五四”传统的紧密联系。这一传统之丰富和创新，远远不是那些抱残守缺、

自鸣得意、不肯出正统门户半步的人们的一句“激进反传统”可以否定了事的。

扬州师院中文系的师资大体由两代人组成。老一代中有两类，一类是曾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任教的老师，如来自上海的语言学家王善益、来自北京的文史学者、顾颉刚的弟子李光信、曾留学日本又曾跟随龙榆生、卢冀野学习的章石承等。唐史专家、范文澜的助手卞孝宣也是从北京调入扬州师院的，他并非科班出身，曾做过银行职员。另一类是组建苏北师专时从扬州中学、泰州中学等著名中学调入的中学老师，如文史专家蒋逸雪、唐宋文学专家赵继武、外国文学专家江树峰、文学理论家谭佛雏、语言学家李人鉴、曲学专家徐沁君、历史学家祁龙威等等。这些学者或者有家学渊源，或者曾师从名师，但大多凭依早年训练，自学成材，也可见当年的中学教育之人才荟萃。由于这些学者的地方背景，他们大多能够立足于某一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扬州师院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在江苏省，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扬州师范学院的文科，都可以凭借这些学术群落，在各自领域与北京、上海的高校相拮抗。但1990年代以降，新一轮欧风美雨，学术潮流发生了巨变，加之高校合并，地方院校越并越大，而文科的研究力量却更加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地了。与经济领域的放权让利相伴随的，是经济活动的非中心化和地方化，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研究领域，我们看到的是重新的集中化和中心化。不要说扬州这样的地方，即便是在省会城市，除了极少数例外，地方院校已经很难形成多元并存、各树一帜的局面。

启蒙的氛围

1978年入学的时候，我刚满十八岁。我最希望的，是离开自己熟悉的家、熟悉的环境，但高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就在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八年的生活继续向前绵延。入学之后，除了周末，我很少回家。八个人一间宿舍，不同年龄的同学居住在一处，黄天铨、陆文宝比我年长十多岁，入学前是中学老师，吴星飞是复员军人，张聪已经担任过公社书记。他们不但有工作经历，有些还有婚姻生活，即便年轻一点的，也对异性或另一种生活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经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而言，是一种启蒙。

我渐渐地融入了这样的生活，有时竟然忘却了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时大家很用功，学校限制夜晚看书的时间，不少宿舍悄悄换上了瓦数稍高的灯泡。我们宿舍也不例外。有一回，学校派人到宿舍检查，不记得是谁先跟来检查的老师顶了几句，争执中，我也介入了。现在完全记不得是什么表现，但事后系里找我母亲谈话，说要给我处分——其实只是震慑而已，并未付诸实施。不过，集体生活让我忘记了自己与这个从小生活的环境的真实关系，却是一种新的身份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在熟悉的环境中，人也能为自己创造陌生感以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师范学院实行伙食配给，每月生活补贴17元，其中14元交给学校算是伙食费。一日三餐，围着每个方桌共八个人，没有凳子或椅子，一律站着吃饭。一个木桶盛饭，一个脸盆装菜，早餐则是木桶稀饭，脸盆里装馒头。我的餐桌上有四位女同学，而全班才十位。相较于邻桌的风起云涌、气吞山河，我们桌子风度较好，和风细雨，有时候饭已经吃光了，菜还有些许剩余。但这也产生了风度与效率的矛盾，需要加以解决。我们开始分食，将菜分到个人碗里，既保持风度，也不顾此失彼。也许每个人都有分菜的义务，但我只记得给我们分菜的女生总是弯着眉毛，带着笑意，用长柄的勺将荤素搭配的菜均匀地放入每人的饭碗。1979

年10月10日，也就是我20岁生日那天，我们在仪征农场劳动。农场的伙食很简单，我完全不能记得吃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用短波听邓丽君的歌。20岁算是成年后第一个重要的生日，我告诉了一位朋友。他建议去六圩镇上去买点什么。我们满怀期待地走到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看见，最后总算是买了一包麻花。不知道那段路程有多长，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是一个对比，即在泥泞的道上走了很久和手中用牛皮纸包着的一包麻花。

好像是入学后的第二年，临近期末，凌晨食堂的锅炉放蒸汽，不知哪位起夜的同学听见了，以为是地震警报的声音。他跑动起来，惊动了更多的人，霎时间空洞的楼道像是中了邪似地晃动起来。二班的一位同学把楼道当跑道，启动，助跑，冲出西侧的窗子，一道优美的弧线划过，从二层楼落入了楼外的池塘，比同年级三级跳冠军飞得还要远。我们宿舍也被惊醒了，一位同学从二层的床上翻身而下，落在窗前的桌上，接着如影随形，身子就到了窗外了；睡在一层床铺上的小徐见上面有黑影掠过，一个鹞子翻身，鱼跃般穿入了夜空。他们在慌张中忘记了自己并没有长翅膀，扑闪了几下，就在黑暗中坠落了。等到同学们从惊恐中镇静下来回到楼内，发现我们宿舍少了两人，往窗外看，见两个形似弯弓的人形，像两只折翅的黑天鹅，相隔不远，一横一竖，各自卧于窗外的草丛中。

我那天没有住在学校。如果住在那里也会飞入夜空吗？我问过自己，但没有答案。等我见到两位勇闯夜空的“黑天鹅”时，他们已经躺在苏北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了。一位脊柱裂缝，另一位肋骨断了四根。两位的父母陪伴在侧。那天我担任看护，恰逢王小舒的叔叔——他是苏北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带着卫校的一群女孩子在那里做临床测试。他抚摸着小徐的身体，从上往下，一寸寸深入，问哪里疼痛。小徐嘴里哼哼着，但等到小舒的叔叔从他的腰部继续往下，要脱掉他的短裤时，他突然不再呻吟了，双手紧紧拉住短裤的两侧，护住大防，脸上显着倔强和无助。实习的护士们见状往后退去，但小舒的叔叔并不让步，他说翻过身来检查后面吧。小徐在父母的劝说下屈服了，结果是先翻了过去，然后又翻了过来……幸而，不久之后，他们都陆续康复，没有落下后患，却从此不再飞翔。

这个年纪的人不免要碰到爱情问题。那时的中文系与现在的中文系的最大差别是同学中男女比例截然相反。现在学文科的多为女生，而那时同班女生大约只占五分之一。入学之前，对爱情的了解，我是从小说中读到的。外国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红与黑》《牛虻》，中国的如《二月》或《伤逝》，还有苏联小说《岸》。入学后，古典文学课中念《诗经》中的相关片断，念杜牧、柳永、李清照的作品，或是《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戏剧、小说，印象很深，但我的爱情观主要是被外国小说塑造的。宿舍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有启蒙作用，但主要涉及性的问题，而与爱情无关。这类段子，我后来在秦岭锻炼时听到了更多，终于相信巴赫金所说，民间文学的精神是“向下的”。大约从二、三年级开始，同学之间的青春热情开始萌发，先是演出诸如《于无声处》等话剧，后是组织乐队和合唱队，各种恋爱故事也渐渐流传，年龄稍大的竟敢手牵手地在校园中穿梭了。有一个同学一度爱上了爱情，表情神秘秘，面色渐渐苍白，样子却越发地神采奕奕了。我们弄不清谁是他的爱情目标。同学们窃窃私议。他总是独自一人，目不旁顾，在窃窃私议的庸人中穿行，如入无人之境。那时，他只有一个目标、一种痛苦、一个念头、一种欢欣，而在别人的眼中，他成了精神病患者。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与王小舒站在三楼教室前聊天，谈及刚读过的通信体爱情小说《公开的情书》。这部作品不是什么好小说，但那种将恋爱当宣言的哲

学方式让我们很震撼。那样的小说与身边的故事很不同。小舒是能够理解那些“哲学”而又懂得生活的逻辑的人。或者说，他懂得自我嘲讽而不放弃哲理式的思维。2010年，我去山东大学，与他及夫人再次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但还那么亲切。他批评我属于读小说有些中毒的类型，至今不懂得“生活”……

1978年至1981年的氛围是所谓“启蒙”。那时知青小说、伤痕文学登上了舞台；徐迟的报告文学和稍后出现的“社会档案”文学也属于这个氛围。到现在还记得《哥德巴赫猜想》开头那段关于仙鹤的描述，后来从电视中看到陈景润的模样，很难将他与徐迟笔下那个鹤顶鲜红、浑身纯白的高蹈形象联系起来。《今天》派的朦胧诗是文体上的启蒙，但扬州并不处于文化中心，北岛、舒婷的诗歌最初是从就读于南京大学的柏鹏那里传抄来的。像许多大学的学生一样，我们班也办起了一个墙报，标题叫做《野花》，而我那时是更倾向于“野草”或者“丛莽”之类的，大概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彭骥鸣的散文、殷伯达的小说，好像还有吴瑞祥的文章，都在上面刊登过，我贡献的，是纯属模仿的朦胧诗。现在只记得一句，是“月亮也落下去了”，大概谁也没有弄懂那是什么意思。

墙报办了一段时期。后来出了批《苦恋》的事情，时间上应该是1981年的夏天。我们想不通，决定举办一个讨论会，公开讨论这件事情。我也是筹备者之一。但不知怎么搞的，校方知道了，觉得是件严重的事情。他们向身为班长的华学诚施压。我记得系主任刘传桂老师等将我们几个参与其事的同学找到系办公室，劝说我们不要举办会议了，我始终拒绝同意。但我并不是班干部，压力不在我的身上。最终会议被取消了。学诚知道我为此不高兴，对他不得不做的妥协有意见。那天晚上学诚来开导安慰我，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这是记忆中亲身经历的自由讨论的第一次挫折。

毕业的时候，学诚终于要离开了，或许就是受了此事的牵连。他很消沉。我那时完全理解他的处境了。跑去看他时，他送了一个本子给我，扉页上写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本子早已不知所终，但从东坡那里借来的两句题诗却记住了。学诚是一个不屈的奋斗者，他后来回到扬州师院，此后又辗转上海，成为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现在我们竟居住在一座城市里，相距仅二十分钟的路程吧。他永远是领导者，当年是班长，现在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连在北京的同学聚会也都是他招呼。对于母校的变化，他比我这个从小生长于斯的人还要清楚。

友谊的形成各种各样，例如与吴星飞的友情是在回家的路上形成。1991年，在他担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时候，我们合作出版了《学人》丛刊；那时他来北京、我去南京，或者在扬州，见面是经常的。吴小平是我的同桌，我们各自早起晚睡，背诵英文和古文，他有时候喜欢比试，利用他的超强记忆力想压倒我；每次看我说不出某个英语单词时，就得意地笑。好多年后，他担任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负责人，促成了我们与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了多语种的文化研究刊物《印迹》。我们也因此有机会时时碰面。1993年，我在瑞典与高建平、李明夫妇相见，又一道去俄国、丹麦和希腊旅行，再往后建平回到国内，成为我在文学所的同事。

殷伯达是才子。那时他常常将写出的小说手稿交给我看并提意见，我就在灯下一页页翻过去，用铅笔在旁边做注释和评论。他心高气傲，但在临毕业前，忽然发现尾骨部位有增生，开刀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的腿从此有些轻微颠簸。有一度时期，这个疾病到底会怎样发展并不清楚，重复做了手术，他情绪低沉。但也恰在此后，经同学的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夫人小张，一位贤慧的女性。没

有她的精心照料，伯达的生活恐怕是两样的。他毕业后的那个时期，我们交往很多。病与婚姻，对于伯达的情绪和性格的改变，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为深刻。或许对所有人来说，这两件事情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够改变并型塑人的生活的特别重要的力量。

1996年起，我在《读书》编辑部兼任主编，突然收到老同学周群的一个朋友的来信，说周群病逝了。我大惊失色。来信讲述了周群在南通电视台工作的一些情况。这位朋友说周群谈起过我，她很为周群的不幸和曾经遭受的委屈抱不平，希望我能够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在静静的夜中，我搜罗关于她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形象渐渐浮现，那么美好。她扔铅球很远，但笑起来很文静。班上编组时，她曾跟我分在一组，记忆中，她总是安静地坐着，话不多。偶尔在校园里见到她，她总是挎着一个军用书包。不知道哪来的印象，似乎她的家庭有点军队的背景。毕业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文章发表在南通的报纸上。不久之后，收到周群父亲的来信，说很感谢，也很欣慰。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同学写悼文。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的读书兴趣渐渐地偏向近现代思想和文学。那时与刘祥安聊得很多。他是兴化人，地道的农民出身，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思考习惯。每次他从兴化来学校，总会带盐水瓶装的家酿烧酒一瓶，我们就着简单的熟食，时时喝得面红耳赤。临毕业前，祥安与杨汉彬相恋，此后一道去了启东。我有一次去那里看他，汉彬挺着大肚子给我们做螃蟹下酒。下午我和祥安去散步，坐在海边看黄色的浪涛拍打堤岸。祥安若有所思地说：波浪缓缓的、持久的拍打是最深刻的……我们那时一起读李泽厚的思想史论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这部《时论文选》，我至今在教学中还用。

我从中文系毕业，后来的研究集中于思想史领域，那时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的思想的氛围——大概是起了作用的。但真正衔接起这两个领域的，是对鲁迅研究的兴趣。扬州师院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也是一个较强的领域，除了章石承、郑彤等老一代的先生们之外，中年一代的老师如曾华鹏、李关元等在现代文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文革”期间，鲁迅作品是必读书，扬州师院中文系参与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曾、李两位老师承担的是《野草》注释。他们对《野草》及鲁迅小说的研究深入、细致、微妙。李关元老师的课长于文本分析，细致入微又留有思考的空间。他喜欢中外戏剧，会哼京剧、昆曲的唱段，在他的指导下，我除了系统阅读曹禺、老舍、丁西林、洪深等人的现代戏剧文本之外，也对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作品着迷。我从未从事过戏剧研究，却对戏剧及其表演保留浓郁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我所读的剧本中，最喜欢的也是演员们很难处理好的一句台词，是《海鸥》中的这句话：

“我是一只海鸥！……呵，不！不！我是一个女演员！”

谁是 1977 级？

在 20 世纪，时代这个词神圣而又普通。我入学时 18 岁，而年长的同学的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职员、知青，或者还有其他的身分，在这个时刻都变成了大学生。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77 级，还有 78 级，大学生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那里的主人公们遭逢各种事件时，总会慨叹——“生活啊！”在念这个词的语调里，凝聚着只有在 19 世纪的俄罗斯才具有的意义，若用王朔的方式念，或用张艺谋、冯小刚的方式念，味道就变成“非诚勿扰”了。我们恰好就在

这两种慨叹的方式之间各自展开自己的道路，如高速行进的车轮，不同的要素辐辏般地关联在一个奇异的速度之中。我们颠簸向前，弄不清这个车轮是圆的，椭圆的，还是近于方型的，辐辏之间是否还有断裂的虚线，却少有旁顾的从容。走笔至此，忽然忆起 1990 年我在秦岭山中蹬着自行车，蛇形蹒跚前行。登至峰顶，四面豁然开朗，举目张望，夕阳浸染的云层下，唯见苍山如海，过去的行迹与未来连成了变幻的一片。有时候，你说不清哪儿是你的过去，哪儿是你的未来。老马克思说过：“成人不该在更高的阶段上重现他的真情吗？在每一个时代，它自己天然的纯真性格岂不是活跃在儿童底天性之中吗？为什么人类历史底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它的永恒的魔力呢？”

……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就是在那一年，我的老师章石承先生在扬州病逝，另一位老师唐弢先生一病不起，长卧于北京协和医院。三十一岁生日的那天，在秦岭之颠，我在笼罩着烟雨的山峦和激出白色浪花的深涧之间，眺望遥远的北京，心里开始了对于故乡的漫长的思念。青春的岁月过去了。

毕业三十年了，过去岁月的痕迹还在体内作怪，就像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甦生，逼迫我们回望自己塑造的过去。就像被搅起的沉在河底的落叶，再次翻卷于宽阔的水体，那些微澜并不只是水面清风的造物，落叶自身的微力或许也是造成变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谁能区别浪花和深流呢，它们相互转化，本属一体，倒是落叶的漂流标示着运动的方向。生活就如博尔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注：此文系为大学毕业 30 周年纪念而写，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在新德里动笔，陆续写下，2 月 24 日完稿于北京。10 月间应北岛、李陀之邀重新修订成篇。

